

ICNC 专著丛书


# 在非暴力运动中 非暴力纪律的保持与破坏

乔纳森·平克尼



中國權利在行動 翻譯

**ICNC**  
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



## ICNC 专著丛书

丛书编辑：麦西吉·巴特科沃斯基  
本书编辑：安伯·弗兰  
装帧设计：大卫·莱茵博尔德  
ICNC出版社出版

### 本丛书中的其他书籍：

胡安·马沙洛《原地不动的力量：对哥伦比亚武装团伙的非暴力抵抗》（2015）  
丹增多吉《藏人的非暴力斗争：战略与历史分析》（2015）

ICNC出版社  
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  
美国华盛顿特区  
宾夕法尼亚大街1775号12楼

© 2016 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  
乔纳森·平克尼  
版权所有. ISBN: 978-1-943271-06-1

### 封面照片：

左图：2014年乌克兰广场革命期间，首都基辅的一名抗议者把玫瑰花插在防暴警察的盾牌上。

图片来源：乌克兰广场革命期间的一个博客

右图：2010年10月西巴布亚争取从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期间，抗议者展现了非凡的非暴力纪律。

图片来源：维基共享

### 封二照片：


1960年美国民权运动期间，非洲裔美国大学生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午餐柜台前静坐，挑战种族隔离制度。

图片来源：纪录片《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同行评审：本书是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专著丛书，在出版前经过了三道同行盲审。本中心专著原稿的独立评审员包括非暴力抵抗领域和相关学科的学术专家与非暴力运动活动家。

出版声明：本出版物使用的名称和资料不代表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的观点。选择和呈现本书事实的工作，以及书中表达的观点，由笔者文责自负。





# 在非暴力运动中 非暴力纪律的保持与破坏

封三照片：

1960年美国民权运动期间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

图片来源：纪录片《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封四照片：

2014年7月，美国民间组织“犹太和平之声”与“犹太人说不”在纽约抗议以色列占领加沙。  
图中标语：美国犹太人支持人权，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图片来源：维基共享



## 摘要

非暴力抵抗研究和实践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非暴力运动怎样才能使其成员保持非暴力纪律。尤其是在面临暴力镇压的时候，哪些因素能够鼓励和支撑人们保持非暴力纪律？已经有许多学者对此问题给出了答案，但是这些答案通常只针对具体情境，没有经过系统性的检验。本书针对这一缺陷，提出了有关非暴力纪律的统一理论。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非暴力纪律是如何维持，并受镇压影响的。本书根据这一理论，使用两种方法检验了若干影响因素对非暴力纪律的作用。第一种方法是检验镇压模式、非暴力抵抗历史、运动的领导方式和组织结构对非暴力纪律的影响。第二种方法是比较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在后共产主义“颜色革命”中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从这两种检验方法中获得的核心研究成果如下：

- 镇压总是会削弱非暴力纪律，这强化了以下观点：运动需要精心制定战略应对镇压。
- 在政府对运动做出让步之后，非暴力纪律通常会显著下降，这可能是由于运动过度自负，或者运动出现了分裂。
- 有公开的内部争论、相互对立的思想流派甚至冲突的非层级制运动，能够更好地保持非暴力纪律。这一点告诉我们，如果运动要加强非暴力纪律，就应该去中心化，努力让参加者意识到运动他们是运动的一部分。

研究还为进一步研究非暴力抵抗运动和制定战略提供了建议。主要包括：

- 对学者的建议：要对有利于保持非暴力纪律的个人层面的因素做更多的研究，尤其是培训的质量、性别因素和同伴的影响。
- 对非暴力抵抗活动家的建议：运动不要依赖层级制，要始终如一的强调非暴力纪律，要加强个人对运动的参与感。
- 对外国的公民社会和政策决策者的建议：通过社会倡导反对镇压，尽可能早的对运动给予支持。



## 目 录

摘要

序言

### 第一章：理论与文献回顾

暴力、非暴力与非暴力纪律

非暴力纪律的来源：伦理与战略

非暴力纪律的其他来源

非暴力纪律的理论

非暴力纪律的预期影响因素

### 第二章：统计检验与结果

统计检验结果

### 第一章：“颜色革命”比较

塞尔维亚：要推土机不要子弹

格鲁吉亚：议会中的玫瑰

吉尔吉斯斯坦：流血的郁金香

### 第四章：案例研究分析

历史经验

与历史上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有关的培训和信息

历史上使用过的非暴力抵抗战术

历史上的政治让步

运动领袖呼吁非暴力纪律

运动领导层强大、有凝聚力

运动战略目标稳健



运动做出避免对抗的战术选择

制定成员资格标准，把暴力分子排除在外

运动参加者高度多样性

运动对暴力行动的惩罚

政府对非暴力行动的镇压

结 论：把非暴力纪律的知识应用于实践

与学者有关的研究成果

与活动家有关的研究成果

与外国公民社会和政策制定者有关的研究成果

统计附录

结果与讨论

引用文献

案例研究资料

图表清单



## 序言<sup>1</sup>

---

1930年，圣雄甘地呼吁印度人民参加反对英国统治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特别是反对殖民者垄断制盐业的行动，打破禁止家庭制盐的法律，挑战英国统治的正当性。但是，这个运动最有力量的时刻不是挑战制盐法，而是当局暴力镇压和平抗议者的时候。当时，甘地的追随者向达兰沙纳制盐厂行进，并准备和平占领使其停产。驻扎在制盐厂的士兵阻止他们进入，并且野蛮地殴打他们。

根据当天的新闻报道，和后来理查德·阿滕伯勒拍摄的电影《甘地传》中的描述，抗议者在遭到野蛮袭击的时候既没有使用暴力还击，也没有屈服，而是和平、坚定地继续前进，一排接一排被打倒在地。这场暴力镇压成为印度独立运动中最有力量的时刻，因为和平主义者的非暴力纪律显示了殖民统治者的暴戾和印度独立事业的正义性。

30年之后，在美国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一群非洲裔美国学生坐在几个“白人专用”的午餐柜台前，十分礼貌地要求提供午餐。遭到拒绝之后，他们拿出书本坐在柜台前开始学习。他们的反应不是愤怒和暴力，而是安静但是决不放弃斗争的决心。此前，他们接受过不要回应挑衅的培训。此后，这些学生和其他许多人一起继续非暴力占领纳什维尔和整个南方的午餐柜台。白人顾客一再试图将他们赶出去，采用的方式有暴力威胁、用侮辱性的语言大声叫骂，甚至直接使用暴力，比如把学生推到地上，把点燃的香烟摁到学生的身上。但是学生们始终保持平静、和平和非暴力纪律，不给当局镇压他们的借口。学生们的非暴力纪律和决心，最终废除了纳什维尔种族隔离制度，并且成为反对吉姆·克劳法<sup>2</sup>种族压迫的美国民权运动的转折点。

---

<sup>1</sup> 感谢麦西吉·巴特科沃斯基、埃里卡·切诺韦思、布赖恩·马丁、哈迪·梅里曼、宝琳·摩尔和一位匿名评审员，为本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意见和讨论；还要感谢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为本研究提供的支持。

<sup>2</sup> 是美国一系列地方和州法律的统称，该法允许各州种族隔离。几乎所有原蓄奴州都实行了该法。该法19世纪末由密西西比州最早开始实施，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投票权法案》后废除。1967年最高法院判决该法违宪。吉姆·克劳是美国流行音乐剧《蹦跳的吉姆·克劳》中一个地位低下，受白人歧视、侮辱的黑人角色。克劳在英文中是乌鸦的意思，是对黑人的蔑称。——编译者注

在这些著名运动和全球其他许多运动中——从反腐败（拜尔勒，2014）、争取民族解放（巴特科沃斯基，2013），到推翻专制独裁统治（切诺韦思和斯蒂芬，2011），这些充满献身精神的非暴力行动者成功地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世界几波主要的非暴力运动（比如1980年代末的东欧推翻共产党政权，21世纪初的“颜色革命”，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向全世界证明，即使在最严峻的环境中，非暴力抵抗也能成功地向强权提出挑战。

学术研究已经证明了非暴力行动的有效性。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非暴力运动的传统显示，非暴力行动有可能解决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反对不公（马丁，2007），甚至保护国家免遭入侵（罗伯茨，1967；博塞鲁普和麦克，1974）。许多学者对一些特定的非暴力运动（朱恩斯等人，1999；罗伯茨和加顿·艾什，2009；纳普斯泰德，2011）进行过分析，比如印度独立斗争（斯里达兰尼，1939）、美国民权运动（麦克亚当，2010；艾萨克等人，2012）、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朱恩斯，1999）、巴勒斯坦“大起义”<sup>3</sup>（金，2009；霍尔沃德，2013）、塞尔维亚“推土机运动”（本尼迪克和马罗维奇，2006）。最近，埃里卡·切诺韦思和玛丽亚·斯蒂芬的研究结果显示，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大约是暴力运动的两倍（切诺韦思和斯蒂芬，2011），<sup>4</sup> 这激发了对非暴力运动进行研究的热潮。

这些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学者们所说的非暴力纪律。就像印度进军达兰沙纳制盐厂的和平主义者和美国静坐纳什维尔午餐柜台前的学生一样，许多斗争中的活动家都勇敢、坚定地保持非暴力纪律，拒绝以暴制暴。非暴力纪律能够“把对手的镇压行为暴露在最苛刻的目光下”（金，2002），这常常能够引发“反作用”（赫斯与马丁，2006）或者“政治柔术”

**没有非暴力纪律，统治者及其支持者就能够成功地把反抗斗争描绘成危险而具破坏性的行为，让普通民众支持他们对运动的镇压。**

<sup>3</sup> 指1987年12月开始的巴基斯坦人抗议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占领的行动。斗争一直持续到1991年国际社会为解决巴以冲突的马德里会议召开，也有人认为斗争结束的时间是到1993年巴以双方签署“奥斯陆协议”之后。在这一期间，巴基斯坦人主要采用抗议、罢工、抵制，拒绝纳税等方式进行反抗，以色列军队在镇压起义过程中造成近2000巴基斯坦人伤亡。——编译者注

<sup>4</sup> 这一研究分析了许多重要问题，包括非暴力抵抗运动爆发的原因，有助于非暴力抵抗运动取得成功的因素，非暴力抵抗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证明这一研究的杰出例子，见布雷斯韦特等人，2015；布彻和斯文森，2014；切诺韦思和乌尔费尔德，2015；格莱迪奇和里韦拉，2015；以及怀特等人，2015。



（夏普，1973）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非暴力活动家的暴力镇压，会损害压迫者的合法性，并且证明非暴力活动家的事业是正义的。使民众转而支持非暴力活动家的事业，从而削弱压迫者的权力。

没有非暴力纪律，统治者及其支持者就能够成功地把反抗斗争描绘成危险而具破坏性的行为，让普通民众支持他们对运动的镇压。即使是零星的暴力事件，也会损害非暴力运动的影响力，降低非暴力抵抗的参与率（夏普，1973；切诺韦思和舒克，2015；戴等人，2015）。因此，非暴力运动的活动家和学者几乎一致认为，非暴力纪律是非暴力运动成功的关键因素（波波维奇等人，2007；阿克曼和杜瓦尔，2006；纳普斯泰德，2011）。

非暴力纪律来自哪里？运动怎样才能鼓励人们维持这种纪律？具有变革精神的非暴力运动领袖（比如圣雄甘地和詹姆斯·劳森）对如何在运动中促进非暴力纪律的各种方法进行了广泛地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也提出过许多建议。但是，至今为止，还很少有关于哪些因素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促使各种运动都能保持非暴力纪律的研究。

本书提出了一个有关非暴力抵抗运动中的非暴力纪律的普遍性理论，这一理论由一系列论述和一个数学模型组成。这一理论框架用十分简洁和抽象的方法，首次提供了一套系统性的工具，让学者、教育家，非暴力运动的组织者和活动家能够用来理解以下问题：哪些基本因素会使保持非暴力纪律更加容易或者更加困难。本书还提出了一系列可能会对非暴力纪律产生预期影响的因素。

虽然这一理论的总体逻辑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环境下的政治斗争（无论是否会遭遇镇压），但本书关注的是非民主国家的反政府运动，这些国家的政治环境往往会出现镇压，而且双方都常常使用暴力。因为在这些环境中保持非暴力纪律非常困难，所以更需要了解哪些因素能够始终促进非暴力纪律。

本书分为四章。第一章回顾了某些涉及非暴力纪律和更广泛的非暴力行动领域的学术文献，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

第二章用1991-2012年间14个国家的反政府运动的将近18,000次行动的统计数据，检验了有关非暴力纪律理论的假说。检验使用的数据来自非暴力与暴力运动及其结果（NAVCO）3.0数据库，该数据库收集了有关暴力和非暴力反政府行动的详细信息。由于NAVCO 3.0包

括了每次具体行动的详细信息，因此，它提供了检验非暴力抵抗运动是怎样保持或破坏非暴力纪律，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保持或破坏非暴力纪律的理想方法。<sup>5</sup>

第三章集中比较了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在这三个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突出案例中，遵守非暴力纪律的程度有所不同。

第四章提供了研究结果的概要，说明了本研究结果对非暴力运动的组织者、活动家和战略制定者有哪些潜在的用途，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

<sup>5</sup> 有关 NAVCO 3.0 的结构、资料来源和特点的更多信息，见本书的统计附录。



# 第一章 理论与文献回顾

## 暴力、非暴力与非暴力纪律

虽然论述非暴力抵抗问题的文献中普遍使用非暴力纪律的概念，但是不同的学者在使用这个概念时的具体意义有很大差异。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学者们对与之相关的暴力 and 非暴力的概念存在争议。正如研究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学者安德斯·博塞鲁普和安德鲁·麦克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说过的：“已有的文献没有对非暴力的定义达成共识。”（博塞鲁普和麦克，1974，11）。道格拉斯·邦德也曾经说过：“给非暴力下定义十分具有挑战性，因为这一概念承载着巨大的情感意义和对行为的规范意义。”（邦德，1988）。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学者和活动家出版了大量的文献<sup>6</sup>，但是，与“暴力”和“非暴力”的定义有关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马丁内斯，2015）。这些争论十分复杂，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但是，本书将对与“暴力”和“非暴力”有关的一些基本论点进行简短的介绍。

关于“暴力”的定义，研究和平问题的学者认为：不是只有直接的身体伤害才是暴力。早期和平研究的学者约翰·加尔贡认为：暴力是“对人类施加影响，使其肉体和精神实际发挥出来的潜力低于可能发挥出来的潜力”（加尔贡，1969，168）。加尔贡的定义既清晰又简洁，在该领域非常具有影响力。

对“非暴力”的定义也有非常多的争议，从围绕不使用身体暴力的狭义定义，到涉及对于特定生活方式的信仰，以及对他人的态度等广义定义。有些学者对这些差异进行了分析，分析的方法是把作为个人信仰系统的“非暴力”与作为一种积极的政治斗争方法的“非暴力行动”做对比（舒克，2005，2015年5月）。<sup>7</sup> 甘地在表述关于“消极”和“积极”的非暴力主义的概念时，把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伊耶，1973）。一方面是指不伤害他人，另一方面是指由

---

<sup>6</sup> 有关学术文献的，见阿克曼和杜瓦尔，2000；阿克曼和克鲁格，1993；赫尔维，2004；纳普斯泰德，2011；罗伯茨和加顿·艾什，2009；舒克，2005；夏普，2005；萨米，1994；朱恩斯等人，1999；等等。

<sup>7</sup> 本书主要遵循这一原则，即把一系列更加广泛的道德实践称为“非暴力”，把在斗争中不使用暴力而行使权力的战略称为“非暴力行动”或“非暴力抵抗”。（夏普，1999）。

于爱而采取积极行动。马丁·路德·金在描述非暴力斗争时指出：“不仅要‘避免’使用外在的身体暴力，也要‘避免’使用内在的精神暴力”他还说：“非暴力斗争的天然目的是寻求和解（金，1957）。”詹姆斯·劳森是把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和行动的思想传播到美国民权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认为：“宽恕是非暴力的核心”（艾萨克等人，2012）。

在非暴力运动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学者吉恩·夏普则把非暴力行动定义为“一种在斗争中不使用暴力而行使权力的社会政治行动战略”（夏普，1999，567）；还有一些人的定义与吉恩·夏普表述的类似（舒克，2005；切诺韦思和斯蒂芬，2011）。他们使用的都是非暴行动的消极定义，但其积极意义在于，他们认为非暴力行动是积极的、体制外的政治斗争。“不作为”可能也是“非暴力的”，但那显然不是“非暴力行动”（戴等人，2015）。

虽然笔者同意在“非暴力”的定义中纳入更加广泛的道德原则十分重要，也同意甘地等道德和哲学理论家所做的重要工作，<sup>8</sup> 但本书主要根据吉恩·夏普提出的定义。

甘地和美国民权运动的先驱都认识到“纪律”在非暴力运动中的重要性。甘地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提出，纪律与非暴力行动是否能够成功有关，而且还是更大的个人自律问题的一部分（甘地，1999）。美国民权运动受到甘地的启发，也强调要严格而有纪律的实施非暴力行动，使参加者的行动造成的影响最大化，使对手用来对付运动的暴力镇压手段失去合法性。理查德·格雷格等早期非暴力行动理论家也谈到“纪律”对于非暴力行动的重要性，但是他们讨论的非暴力纪律的范围非常广，而且主要是关于个人实践方面的问题（格雷格，1935，224-250）。

吉恩·夏普可能是最早深入讨论非暴力纪律这个概念的学者之一，但他的定义并不十分明确。他把非暴力纪律定义为“遵守一定的最低行为标准”（夏普，1973，615）。但是，根据吉恩·夏普的更多论述，这一最低行为标准显然包括不使用身体暴力，也包括其他与坚持运动的目标有关的元素，比如愿意参加、组织或者从事与非暴力运动有关的细微、重复的工作，严格听从运动组织者的命令等等。在吉恩·夏普这一最低行为标准的概念中，非暴

---

<sup>8</sup> 确实，在有关非暴力行动的研究中，许多基础性的语言都源于甘地。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见金，2014，296。



力纪律的重点是纪律，非暴力被理解成，在为更大的目标服务的过程中个人自律的一个方面。

马蒂尼将非暴力纪律定义为“坚持遵守非暴力活动团体成员的最低行为标准”（马蒂尼，2013，104-5）。和夏普的定义一样，他强调的也是纪律：“最低行为标准”包括不使用身体暴力，但是也可能包括许多其他元素，比如遵循运动组织者的战略规划，用尊重和关心的态度对待运动的其他参加者等等。

而在其他许多论述非暴力抵抗问题的文献中，非暴力纪律一词往往都是指不使用身体暴力。比如在有关“政治柔道”或者“反作用”（这两个词暗示着镇压非暴力运动会对使用暴力的当局不利，会对压迫者的能力产生消极影响）的论述中，都使用了这种非暴力纪律的定义（赫斯与马丁，2006，萨顿等人，2014），即非暴力纪律重点在非暴力，纪律只是用来说明行为的一致性。

我们怎样才能描述和衡量一场非暴力运动有没有遵守了非暴力纪律呢？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直截了当的“或者……或者……”框架。非暴力运动或者被描述为“维持”了非暴力纪律，或者被描述为“未能维持”非暴力纪律。但是，作为运动的组织者、实践者、知识分子中的活动家，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世界中，把这一简单的“全有或全无”二分法用于整个非暴力运动中是有问题的。

对非暴力纪律使用简单的“全有或全无”二分法，最大的问题在于，从“维持”非暴力纪律到“未能维持”非暴力纪律之间的界线不是十分清楚。所有参加运动的人都完全不使用任何类型的暴力，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如果仅仅一个使用身体暴力的例子就使整个运动失去作为非暴力运动的资格，那么，在整个斗争期间，自始至终维持了非暴力纪律的大规模非暴力运动的数字会非常低。但是，除了这一绝对标准之外，我们又很难给“维持”非暴力纪律制定一个明确的，符合逻辑的，而且不武断的标准。因此，本书没有使用“全有或全无”的非暴力纪律定义，而是使用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框架：首先考虑运动参加者个人，然后再考虑整个运动。

在个人层面上，本书把非暴力纪律定义为：不对他人或财产使用或者威胁使用身体暴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定义：任何程度的身体暴力都是违背非暴力纪

律的行为。但是，个人层面上使用的暴力也有程度上的不同，因此，在分析违背非暴力纪律的情况时，本书试图使用合理的、相对暴力程度的标准。比如在示威中打破窗户和用手枪射击警察都是个人层面上违背非暴力纪律的行为，但笔者认为，第二种行为违背非暴力纪律的程度要大得多，后果也严重得多，构成了对非暴力纪律的严重破坏。<sup>9</sup>

在非暴力运动层面上，<sup>10</sup> 本书定义保持非暴力纪律程度的方法，是把克制和实施身体暴力有关的个人行为汇集起来。运动中实施暴力的人越多，其暴力行为的频率和程度越高，运动的非暴力纪律就越差。根据这一定义，非暴力纪律很少是“全有或全无”的。运动保持非暴力纪律的程度高低，取决于大量运动参加者个人的行为。运动的非暴力纪律有时会非常高：大多数参加者都能保持非暴力；有时会比较低：运动整体上是非暴力的，但是有许多个人使用暴力的案例。

本书遵循了若干论述非暴力行动的重要著作的方法（阿克曼和克鲁格，1993；切诺韦思和斯蒂芬，2011），把非暴力运动限制为以非暴力战术“为主”的抵抗运动。<sup>11</sup> 运动中参与暴力行动的人数增加到一定比例，暴力行动的程度和频率也有类似的增加之后，再称这场运动以非暴力战术“为主”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本书没有把运动用非暴力和暴力的二分法进行

---

<sup>9</sup> 关于暴力和非暴力抵抗之间的“灰色地带”，活动家和理论家之间有着很有意义的讨论。比如，有些人认为破坏财产不属于暴力抵抗。在巴勒斯坦争取国家地位的斗争中，许多人认为扔石头不属于“暴力”，因为那不涉及使用武器，而且对通常的攻击目标——以色列士兵造成实际伤害的可能性也很小，属于一种本能的象征性抗议。这些讨论当然是有意义的，不过本书采用了一个更加简单，更加实证主义的定义：即使是那些仅仅造成了最低程度的实际伤害的行动，也可能被认为是有害的或者有威胁的。有关暴力问题“灰色地带”的讨论，见博塞鲁普和麦克，1974，40-44；夏普，1973，608-11。专门讨论巴勒斯坦运动中的扔石头现象的文章，见霍尔沃德，2013；金，2009。

<sup>10</sup> 本书使用的“非暴力运动”的定义，来自阿克曼和克鲁格（1993），以及切诺韦思和斯蒂芬：“一系列可以观察到的，用以追求某个政治目标的连续战术”（切诺韦思和斯蒂芬，2011，14）。

<sup>11</sup> 在本书中，“非暴力方法”和“非暴力战术”两个术语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它们都是指某个特定的非暴力行动。或者按照阿克曼和克鲁格的定义：“在具体的对抗中，针对对手及其机构实施的（非暴力）行为”（阿克曼和克鲁格，1993，7）。吉恩·夏普将其形容为非暴力斗争的“武器系统”（夏普，1973，113），他还把198种具体的非暴力行动方法分为三大类：“抗议与说服”、“不合作”、“非暴力干涉”。吉恩·夏普的分类相当系统，另一些学者也使用了类似的术语来描述战术，比如“抗议、抵制、群众示威……以及建立替代性机构”（朱恩斯等人，1999，2）。



划分，而是根据运动的暴力程序分为5个类型，从有着几乎完美的非暴力纪律的运动一直到武装起义，如图1所示。<sup>12</sup>

图1. 非暴力纪律光谱



这一定义并不打算贬低其他更加理论化定义的价值。一些学者和理论家把暴力概念扩大到更加微妙和间接的压迫中，比如结构性的暴力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歧视，这十分重要。不过，本书坚持认为，理解非暴力运动中，这种更加狭义、更加实证主义的非暴力纪律何时会遭到破坏，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非暴力纪律的来源：伦理与战略

到目前为止，对非暴力纪律的研究相对较少，学者们也很少围绕这一主题进行讨论。与之相关的最重要的讨论，就是非暴力抵抗应该主要“基于原则”，还是主要“基于实用”的问题。<sup>13</sup> 第一种观点认为，非暴力纪律应该出自信仰或者信念，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非暴力纪律应该出自战略考量（博塞鲁普和麦克，1974；伯罗斯，1996；梅，2015；纳普斯泰德，2015；舒克，2015）。这与前面提到的非暴力或非暴力行动的定义有关，因为有些人认

<sup>12</sup> 类似的概念，见朱恩斯，1994。  
<sup>13</sup> 案例见克莱门斯，2015；豪斯，2013。

为，要采取真正的非暴力行动，就必须在非暴力运动中融入道德元素（兰德尔，1994；伯罗斯，1996）。

在这一争论中，人们常常受到圣雄甘地和吉恩·夏普等影响力的人物的启发。从甘地那里获得启发的人们认为，非暴力行动只能是一种道德实践，而吉恩·夏普的追随者则更多的将非暴力行动视为一种实现政治变革的手段（舒克，2005）。这些笔者中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持“基于原则”或者“基于实用”的观点。他们都强调，原则和实用因素是相容的。但是，甘地强调，非暴力的力量不仅是一种政治斗争手段，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修炼和发现真理的问题（甘地，1999）。因此，甘地成为那些更多“基于原则”的角度对待非暴力行动的人们的思想来源。吉恩·夏普的著作则强调，非暴力行动是实现政治变革的有效手段，它不需要人们做出任何道德或者伦理方面的承诺（夏普，1973、1979、2005）。因此，吉恩·夏普成为那些更多“基于实用”的角度来对待非暴力行动的人们的启发来源。

在实际的非暴力抵抗斗争中，实用和原则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事实上，重要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很少是由和平主义者领导的。正如乔治·莱基所言：“多数和平主义者不从事非暴力抵抗，多数从事非暴力抵抗的人不是和平主义者”（莱基，1987，87）。阿克曼和克鲁格甚至说：“没有证据显示，绝大多数已知的非暴力斗争案例中，出现过基于原则的非暴力观念，或者这种观念曾经对非暴力斗争的结果做出过重大贡献。”（阿克曼和克鲁格，1993，4）。

**在实际的非暴力抵抗斗争中，  
实用和原则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

但是，许多表面上“基于实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都曾经利用“基于原则”的思想来强化自己的非暴力形象。（索伦森和维特哈根，2012）根据政治斗争的手段往往预示其目标这一思想，许多运动组织者都认为，选择非暴力行动既是基于原则，也是基于实用（兰德尔，1994）。原则和实用这两个范畴常常彼此重叠、相互交织。

以上两种观点对于非暴力纪律的意义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基于原则的观点认为，打破非暴力纪律是道德上的失败，破坏了运动的自我认同。基于实用的观点认为，打破非暴力纪律是战略上的失败，破坏了有效的非暴力抵抗的政治格局，会失去潜在的盟友或第三方支持者（夏普，2005，489），还会使暴力镇压合法化（本尼迪克和马罗维奇，2006）。

从实证上来说，这两种路径所指出的与非暴力纪律有关的行为模式相当相似，在这两种情况下，运动领袖都应该阻止其追随者从事暴力行动。不过，那些“基于信仰”的运动领袖更可能会坚守这一模式，而那些“基于实用”的战略考量的运动领袖则有可能容忍，也有可能不容忍破坏非暴力纪律的行为，这取决于他们认为哪些因素能够提高斗争的整体效果。在下面的实证讨论中，笔者还将更加详细地探讨这一问题。

一些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领袖曾经就鼓励或者保持非暴力纪律提出过大量的建议。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是，在美国民权运动中，詹姆斯·劳森创办了纳什维尔学校，通过角色扮演等培训来传授非暴力行动的原则，培训参加者如何保持非暴力纪律。

### 非暴力纪律的其他来源

除了原则/实用的观点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在比较了全球主要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之后，就保持非暴力纪律的问题提出过一些建议。吉恩·夏普（1973）就运动如何鼓励非暴力纪律提出了至少18项建议，比如由军乐团组织示威；从空间上把抗议者和对手隔离开；要求运动参加者签署行为准则。虽然吉恩·夏普的建议很丰富也很全面，但是他在提出这些建议时几乎没有提到哪些建议适用于哪种特定的情境，或者特定的建议之间有什么关系。比如，他既要求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领袖在面临非暴力纪律遭到破坏时，应该取消行动，又要求他们把组织非暴力行动当作引导参加者愤怒和其他可能导致暴力情绪的方法。到目前为止，吉恩·夏普没有提供一个一致的理论来说明这两个相反的建议适用于哪些不同的情境。

一些学者认为，举办对抗培训是促进非暴力纪律的重要因素。理查德·格雷格提出，有效的非暴力抵抗培训的过程应该与培训士兵的过程一样长，甚至更长（格雷格，1935）。斯蒂芬提出，非暴力纪律来自领导、培训和沟通（斯蒂芬，2006）。《非暴力革命：20世纪后期的非暴力抵抗》一书的笔者沙朗·纳普斯泰德在提出培训和准备工作的重要性的同时，还认为运动领袖要呼吁参加者保持非暴力纪律，他还特别提到宗教人物在提高非暴力纪律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力（纳普斯泰德，2011）。培训如何抑制以暴制暴的冲动，是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的核心部分，也是马丁·路德·金、詹姆斯·劳森等领导的美国民权运动的主要内容（阿克曼和杜瓦尔，2000；艾萨克等人，2012）。



许多学者认为，挑选运动的参加者也是保持非暴力纪律的重要因素。如果允许对运动的非暴力纪律不认可的人参加运动的话，事前进行的非暴力纪律的培训就不一定有效。因此，吉恩·夏普（1973，2005）建议，要有一个限制参加者资格的制度，把那些不愿意遵守非暴力纪律的潜在参加者排除在外。马蒂尼（2013）和赫尔维（2004）都提出过这类年轻人参与运动的问题。虽然年轻人能够给运动带来活力，但是如果不进行精心的培训和组织，年轻人也可能“表现出暴徒的特征”（赫尔维，2004，15）。

运动的领导方式和组织结构，也可能对非暴力纪律产生影响。马蒂尼提出，运动组织者如果善于听取参加者的观点和建议，将更有利于促进非暴力纪律；如果参加者能够对如何执行规则以及何时执行规则提出意见，就不太可能“打破规则”（马蒂尼，2013，100）。他论证道，一个开放，鼓励讨论和不同意见的参与式运动结构，更能够促进非暴力纪律。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运动的凝聚力（即运动是团结一致的，没有分裂成许多相互竞争的组织）和一个集中的层级制领导结构，对于促进非暴力纪律更为重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广泛研究的政治学家温迪·皮尔曼提出，凝聚力对于非暴力抵抗运动十分必要，因为保持非暴力纪律需要协调和集体的约束，只有具有凝聚力的运动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运动的分裂则会鼓励暴力，因为分裂出来的团体在彼此“竞争”新人和注意力的时候，实施的战术会越来越极端，对抗性会越来越强。（2011）

这些关于提高非暴力纪律因素的普遍性论述虽然对于促进我们的理解十分重要，但是缺少一个能够把各种方法联系起来的系统性理论。还缺少一个对各种因素产生的影响进行对比的全面检验。下一节笔者将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再下一节将用论述和数学模型对各种非暴力纪律的预期影响因此进行初步检验。

## 非暴力纪律的理论

这一节围绕运动参加者决定从事暴力行动还是决定从事非暴力行动，建立了一个非暴力纪律理论。这种理论可以概略为“理性选择”，不过这里所使用的“理性”一词定义非常“薄

弱”，它仅仅假设个人是根据一系列特定的偏好采取行动的，而且对得到奖励或处罚的可能性十分敏感。<sup>14</sup>

本理论是用形式化的数学模型作为逻辑工具建构的。这一形式化的数学模型在研究非暴力纪律的问题上有几个重要优点。第一，提供了简单而逻辑清晰的框架。第二，提供了一种把现有文献中提到的各种有关非暴力纪律的解释综合成一个统一的解释方法。第三，提出了一系列非暴力纪律的预期影响因素。

假设在一个非民主国家，有一位活动家正在参加一场反政府示威。再假设示威的组织者号召参加者保持非暴力纪律。这位活动家响应号召的动机会是什么？

第一，对于从事暴力抵抗还是非暴力抵抗，每个人都有特定的偏好。许多稳定的因素（比如个人倾向暴力还是厌恶暴力；文化规范等）能够对这种偏好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不过，还有更加直接的因素（比如事前进行过非暴力抵抗的培训，还是进行过武装斗争的培训）也会对此产生短期影响。笔者用 $b_v$ 来代表个人对暴力行动的偏好，用 $b_{nv}$ 来代表个人对非暴力行动的偏好。<sup>15</sup>

第二，这位活动家还要考虑他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虽然他可能偏好某种抵抗方式，但如果他偏好的选择会带来沉重的个人代价，他就可能改变自己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笔者需要考虑两个重要的行为体：政府与非暴力运动。这两个行为体会对这位活动家的选择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政府往往想要镇压任何类型的政治反对（达文波特，2007）。但是，在许多情况下，镇压的力度和频率会根据反对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而有所不同（利希巴赫，1987）。比如政府镇压暴力抵抗的力度可能会比镇压非暴力抵抗的力度更大，因为它认为暴力抵抗对自己权力的威胁更加直接，或者因为镇压暴力抵抗不会招致外界的谴责（夏普，1973）。笔者用 $r$ 来代表预期的镇压力度，用 $r_v$ 来代表政府对暴力行动的镇压力度，用 $r_{nv}$ 来代表政府对非

---

<sup>14</sup> 对于这一宽泛的理性选择方法的解释，见赖克，1995。

<sup>15</sup> 操纵这些内心偏好，是许多论述非暴力运动（其动机更多是出于道德原则）著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比如，理查德·格雷格曾经就“培养合乎非暴力原则的情感”这一问题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他提出：“如果一名非暴力抵抗者没有完全彻底地培养出这种必要的情感，其心理学规律就必然会发挥作用，那么，他在旷日持久的激烈斗争中一定会失败。”格雷格，1935，191。

暴力行动的镇压力度。个人认为暴力行动会遭到镇压的概率用 $p_v$ 来表示，个人认为非暴力行动会遭到镇压的概率用 $p_{nv}$ 来表示。

第三，非暴力运动本身也可能会对活动家的选择进行奖励或者处罚。我们假设这位活动家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成员，这个运动要求追随者保持非暴力。因此，运动可能会发展出一些机制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奖励或者处罚。

奖励和处罚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一定涉及金钱或者是实质性的。奖励可能只是同伴的积极肯定，或者运动领袖的赞扬。处罚可能十分抽象，比如让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失望或者违背个人承诺带来的良心不安。笔者用 $s_v$ 来代表暴力行为预期会得到的奖励或处罚的力度，用 $s_{nv}$ 来代表非暴力行为预期会得到的奖励或处罚的力度。与镇压的情况一样，个人也会认为受到奖励或者处罚有一定的概率，用 $p_v$ 和 $p_{nv}$ 来表示。

现在，笔者可以使用以下公式，给个人怎样决定使用何种抵抗行动建立简单的模型。在以下条件下，一个人将会选择非暴力抵抗，并且保持非暴力纪律：

$$b_{nv} - p_{nv}(r_{nv}) + p_{nv}(s_{nv}) > b_v - p_v(r_v) + p_v(s_v)$$



表1. 数学模型中的元素

$b_{nv}$	个人在非暴力行动上的利益/偏好。
$r_{nv}$	预期政府镇压非暴力行动的力度。
$s_{nv}$	预期运动处罚/奖励非暴力行动的力度。
$p_{nv}$	对非暴力行动做出反应的概率（包括政府的镇压，也包括运动的处罚/奖励）。
$b_v$	个人在暴力行动上的利益/偏好。
$r_v$	预期政府镇压暴力行动的力度。
$s_v$	预期运动处罚/奖励暴力行动的力度。
$p_v$	对暴力行动做出反应的概率（包括政府的镇压，也包括运动的处罚/奖励）。

总之，笔者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如果这位活动家对非暴力行动的个人偏好，减去非暴力行动预期会遭到镇压的力度，再加上非暴力行动预期会得到奖励的力度，大于他对暴力行动的个人偏好，减去暴力行动预期会遭到镇压的力度，再加上暴力行动预期会得到奖励的力度，他就会选择非暴力行动而不是暴力行动。

这个模型之所以十分有用，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它让我们知道各种保持非暴力纪律的战术之间有何关联。它不是孤立地看待政府镇压或是运动奖励参加者之类的因素，而是提供了一个框架，让我们可以思考所有这些因素是怎样相互影响，从而促使活动家个人做出战术选择的。

第二，它提供了一个框架，让我们可以系统性地思考：在保持非暴力纪律的过程中，哪些因素更加重要。这个框架有意表达得十分抽象，但它也给学者和实践者提供了几个切入点。我们可以通过控制表1中的8个因素来促进非暴力纪律。如果运动的同伴或者领袖提供了外在激励，那么这些因素的力度或水平都是可能调整的。

比如，非暴力抵抗运动可以通过提高 $b_{nv}$ 来加强非暴力纪律，即告诉人们非暴力抵抗的有效性，从伦理或者意识形态上证明非暴力抵抗优于暴力抵抗。运动还可以努力降低非暴力抵抗遭到镇压的可能性或力度，即把静坐之类的对抗性较强的战术，与罢工（指不去上班）、抵制之类对抗性较低的战术相结合（舒克，2005），或者取消预期会遭到镇压的行动。在这8个因素中，运动最容易控制的或许是奖励和处罚暴力行为的可能性和力度。

### 非暴力纪律的预期影响因素

笔者在本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预期能够加强非暴力纪律的影响因素。这个预期影响因素清单结合了早期文献中提出的相关建议和前面介绍的相关理论。

第一，一个国家在非暴力和暴力抵抗方面的历史经验，可能会对非暴力纪律产生很强的影响。历史经验会影响数学模型中的多个因素，从个人偏好因素 $b_{nv}$ 和 $b_v$ ，到预期遭到镇压的可能性和力度（ $r_{nv}$ 和 $r_v$ ），以及预期遭到运动的奖励和处罚的可能性和力度（ $s_{nv}$ 和 $s_v$ ）。如果该国有成功地进行非暴力斗争的历史传统，个人就可能认为保持非暴力纪律有更大的价值。同样，如果该国有成功地进行暴力斗争的历史传统，个人就可能认为保持非暴力纪律没有多大的价值。

不过，历史的经验不会直接为个人所知。虽然主要的非暴力和暴力抵抗或许会成为历史的里程碑，但是对于这些事件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退，或者被审查和暴力所抹去。比如，许多后殖民国家都有过成功的独立斗争，其中都包含了重要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但是这些共同的非暴力特征常常会被历史教科书忽视，必须由后世的学者“重新发现”（巴特科沃斯基，2013）。

传播知识的过程不应局限于一个国家自身的历史。了解其他国家的非暴力抵抗斗争和非暴力抵抗的原理，也能促进非暴力纪律。尤其是如果一个国家与另一个有着成功的非暴力抵抗历史的国家地理位置接近，或者有着共同的文化规范，就能促进非暴力经验和战术的传播（邦斯和沃齐克，2011；格莱迪奇和里韦拉，2015；布雷斯韦特等人，2015）。当然，传播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过程。要想让非暴力抵抗的历史和发展的知识影响到有凝聚力的运动或者潜在的运动参加者，还需要有经验丰富的实践者和其他国家的活动家对其进行培

训、传授或者技术援助（艾萨克等人，2012）。因此，就斗争的历史经验而言，有以下两个相互作用的因素可能会对非暴力纪律产生影响：

**影响因素 1：**有着成功的非暴力抵抗经验的国家，非暴力纪律较好；有着失败的非暴力抵抗经验的国家，非暴力纪律较差。有着成功的暴力抵抗经验的国家，非暴力纪律较差；有着失败的暴力抵抗经验的国家，非暴力纪律较好。

**影响因素 2：**对历史上的非暴力抵抗有普遍了解的运动——特别是这些知识是通过正规培训传播的——非暴力纪律较好。

与非暴力抵抗的历史经验有关的是，一个国家是否存在大量与非暴力抵抗的战略战术有关的知识资源。<sup>16</sup> 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观察到，个人和团体在追求政治目标的时候，往往会复制该国历史上类似的政治斗争使用过的战略战术。比如，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活动家不仅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思想资源中获得启发，也从其所使用的具体方法中获得启发。<sup>17</sup> 虽然某些运动在某些时候也会出现重要的战术创新，但是这种创新通常是逐步产生的，而且是细节上的调整（塔罗，1993）。

一个国家过去曾经使用过的非暴力抵抗战略战术范围越广、种类越多，人们就越有可能拥有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知道在冲突中可以使用哪些非暴力方法。但这与人们认为历史上哪些战术有效关系不大，而与人们根据过去的经验认识到，哪些战术可以使用关系较大。比如，斯迈思（2013）提出，过去参加非暴力抵抗行动的经验，可以以几种方式影响一个人的集体认同，使他们今后更有可能继续从事非暴力抵抗运动。根据这一理论，如果存在广泛、多样的战术选择，会影响一个人内心对非暴力行动的偏好，降低对暴力行动的偏好（提高 $b_{nv}$ ，降低 $b_v$ ）。就如以下表述：

**影响因素 3：**过去使用过广泛、多样的非暴力战术的国家，非暴力纪律较好。

---

<sup>16</sup> 在论述社会动员的文献中，这通常称为一个国家的“斗争剧目”。见蒂利，2010；塔罗，1998。

<sup>17</sup> 相关案例，见戴，2015，或者坎农和夏兹，2015。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外部的政治环境提供的机会。<sup>18</sup> 在通过做出政治让步来鼓励非暴力行动的现代政治环境中，运动参加者更有可能认识到保持非暴力纪律的价值。这能够提高个人对非暴力行为的重视程度（ $b_{nv}$ 因素），进而促进非暴力纪律。

**影响因素 4：非暴力抵抗越是经常能够赢得政治让步，非暴力纪律就越好。**

非暴力抵抗运动自身的一些因素，也会影响非暴力纪律的水平。第一，运动组织者传达出强烈而且始终如一的信息——运动只鼓励非暴力抵抗——或许能够促进非暴力纪律。这也与运动对暴力行动进行处罚的可能性（ $p_{nv}$ ）和力度（ $s_{nv}$ ）有关。始终如一地呼吁非暴力纪律会使人们明白：暴力行为是运动所不能接受的。如果运动组织者没有明确强调非暴力行为的重要性，参加者个人可能就会以为，违背非暴力纪律的行为不太可能受到处罚，或者即使受到处罚也不会太严厉。在这种情况下，非暴力纪律很可能会变得更差。

运动组织者是否传达出强烈而且始终如一的非暴力信息，这一预期影响还涉及到以下问题：非暴力抵抗的动机应该“基于原则”——诉诸伦理原则，还是应该“基于实用”——诉诸非暴力行动的有效性。虽然这两种动机都会发出呼吁非暴力纪律的信息，但是人们通常认为，以和平主义为动机的号召更具有一致性。以实用主义为动机的运动组织者则有可能会在斗争的某个特定时刻，根据他们认为哪种行动“实用”，来改变自己发出的信息。<sup>19</sup> 运动参加者也可能用自己的方式，把运动组织者的呼吁理解为实用主义，或者是为了实现一定的战略效果。这意味着，如果他们认为非暴力不再有效，非暴力纪律或许就不再是一种绝对的价值。

这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出于战略或者实用的理由呼吁非暴力纪律，当然也是明确地要求非暴力纪律，比如要求手段和目的之间要有一致性，使非暴力行动能够带来更加和平的政治变革和一个较为和平的社会。不过，如果呼吁非暴力纪律是基于绝对的道德或者伦理原则，参加者或许更有可能认为，违背非暴力纪律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

<sup>18</sup> 在学术文献中，这通常称为“政治机会结构”。见基奇特，1986。

<sup>19</sup> 这种行为与“基于实用”的非暴力运动理论不符，这一派理论的学者认为，任何暴力行为都会破坏非暴力行动的基本机制（夏普，1973；阿克曼和克鲁格，1993）。但是，这种情况在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领袖中间确实极为普遍。本书的案例研究部分将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一现象。

**影响因素 5：**运动领袖传达出始终坚持非暴力纪律的明确信息，能够加强非暴力纪律。

如果运动领导层本身四分五裂、软弱无力，即使某位领袖始终呼吁非暴力纪律，人们预期运动对其成员施加纪律处罚的可能性和力度也会降低。明确的、层级制的，有着公认的领导权威，能够处罚其成员的运动领导层，是确保运动有能力执行非暴力纪律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如果运动的领导层发生内部分裂，运动的参加者就会认为，领导层在监督、处罚违背非暴力纪律行为方面的能力较弱。内部分裂最突出的表现是内斗——运动领导层围绕政策、战略或者对运动资源的控制发生公开的斗争。运动的内斗和分裂程度提高，运动处罚违背非暴力纪律的参加者的能力就越低。相反，如果运动的领导层权力基础坚实，统一而团结，运动的参加者就会认为，领导层在监督、处罚违反非暴力纪律行为方面的能力较强。

**影响因素 6：**强大、有凝聚力的运动领导层，能够加强非暴力纪律。<sup>20</sup>

运动的目标也会影响个人对暴力和非暴力抵抗的适当性的判断。如果运动的目标特别具有革命性，比如立即推翻某个统治者，运动参加者可能就会认为，需要采取暴力抵抗之类的“极端”战术。如果运动的目标更具有改良色彩，更符合当前的政治话语，运动参加者可能就会认为，采取暴力行动是不合适的，就更有可能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非暴力行动的范围内。

**影响因素 7：**目标稳健，或者具有改良色彩的运动，非暴力纪律更好。

战术是否具有对抗性，通常也会对个人的决定产生重要影响。在发生激烈对抗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感觉愤怒，感觉受到威胁，或者感觉不能后退，这更有可能使运动参加者实施暴力行为。运动领袖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影响参加者的情绪：选择对抗性较低的战术，从有身体对抗的战术转向无身体对抗的战术。比如，在有可能遭到镇压的情况下，组织者放

---

<sup>20</sup> 这一预期影响因素来自温迪·皮尔曼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研究（前面已经提到过），不过笔者对其进行了补充，加入了本书的非暴力纪律理论论证的个人动机因素。

弃街头示威这类让参加者与警察距离很近的战术，采用对抗性较低的战术，比如罢工、抵制或者文化抵抗行动（幽默、讽刺、音乐等）。<sup>21</sup>

笔者认为，那些严重依赖直接身体对抗的战术，更有可能破坏非暴力纪律。采用占领或者非暴力封锁等战术时，参加者的对抗性姿态容易带来高度紧张的情感氛围，让暴力变得更有吸引力。

**影响因素 8：选择避免直接身体对抗战术的运动，非暴力纪律更好。**

前面描述的各国的经验和非暴力抗运动的特点，都会对个人对暴力和非暴力抵抗的态度产生影响。那些有着成功进行非暴力抵抗长期历史和广泛、多样的非暴力战术的国家，运动领袖会明确呼吁非暴力纪律，这些国家的运动采取暴力行动的机会就非常有限。

但是，有些潜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倾向于采取暴力行动，可能仅仅源于个人经历，或者他们天生就有暴力倾向（麦克德莫特等人，2013）。此外，特定的人群——比如未婚青年男子——也更容易卷入暴力行为（赫尔维，2004；马蒂尼，2013）。根据本书所提出的非暴力纪律理论，有些人对暴力行动有高度的内心偏好（高 $b_v$ 因素），不受外界因素影响。从运动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由于有些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实施暴力行动的冲动，运动就需要制定一个成员资格标准，把那些据判断有可能会使用暴力行为的人排除在外，以此来加强非暴力纪律。<sup>22</sup>

**影响因素 9：制定某种成员资格标准，把可能实施暴力的人排除在外的运动，非暴力纪律更好。**

虽然我们期望限制那些只从事非暴力行动的人参与运动，以加强非暴力纪律，但是广泛多样的参加者也能够促进非暴力纪律。如果运动的参加者仅限于社会中的一小撮活动家，他们就可能陷入把其他人“他者化”或者“妖魔化”的心理倾向，这会降低从事暴力行为的耻辱感，会提高 $b_v$ 因素（对暴力的内心偏好）。相反，如果运动有社会各界广泛多样的参加者，

<sup>21</sup>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认为，不合作战术本身就是对抗，而且能够让对手付出巨大的代价。但重点是，身体对抗性较低的战术能够让运动参加者远离高压情境——高压情境中的激烈情绪可能会对运动参加者造成影响，使他们破坏非暴力纪律。

<sup>22</sup> 要想深入了解运动成员资格标准，见马沙洛·J（2015）关于哥伦比亚圣何塞镇和平社区的文章。



包括体制内成员参加其中，或许就会降低把其他人“他者化”的可能性，因此也会降低对运动的对手施加暴力的冲动。

这一观点与切诺韦思和斯蒂芬（2011）关于广泛多样的参与可能会减少镇压的观点相同。切诺韦思和斯蒂芬认为，保安部队在看到自己与运动的参加者有个人关系的时候，就不太可能实施镇压。据报道，在2000年塞尔维亚的“推土机革命”中，警方就拒绝服从向抗议者开枪的命令，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也在抗议的人群中（切诺韦思和斯蒂芬，2011，47）。同样，如果运动的参加者与保安部队中的人有个人关系，运动参加者也不太可能实施暴力行为。让运动有广泛多样的民众参与，会增加运动与对手之间出现对抗关系的可能性。

参加者的多样性还可以通过呈现整个社会团结一心，从事抵抗运动的氛围，来鼓励非暴力纪律。和平的非暴力抵抗行动能够吸引社会各界（比如残疾人、儿童、老人）的参与——他们可能不愿或者不能参与暴力行动。参加者的多样性，能够体现非暴力行动的潜在力量，提高参加者对非暴力行动的偏好（ $b_{nv}$ 因素），降低他们破坏非暴力纪律的可能性。

**影响因素 10：**参加者多样性程度高的运动，非暴力纪律更好。

即使运动有一个团结一致的领导层，并且始终发出明确的坚持非暴力抵抗的信息，那些高度偏好暴力抵抗的人（ $b_v$ ）仍然会有从事暴力行动的动机。运动可以加大对保持非暴力参加者的奖励，或者加大对破坏非暴力参加者的处罚来避免暴力行动的发生。根据上述理论的逻辑，笔者的观点是：如果对暴力行为的处罚足够严厉，即使是强烈偏好暴力行动的人（ $b_v$ ），也可能会选择非暴力行动而不是暴力行动。

笔者在前面已经提到，处罚不一定是直接的或者实质性的。比如害怕被运动排斥或孤立，也可能成为激励因素。还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其他机制，比如参加运动前要签署非暴力行为准则（马蒂尼，2013），即使事后没有实质上的处罚，破坏非暴纪律的人们也会因为食言而产生负罪感。

**影响因素 11：**如果人们因为从事暴力抵抗而受到运动的处罚，非暴力纪律就会更好。

政府的镇压模式会对非暴力纪律产生强烈的影响（利希巴赫，1987；摩尔，1998）。上述理论告诉我们，镇压的问题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说，在压制性的环境中，非暴力纪律不太容易维持。相反，如果从在暴力行动和非暴力行动之间做出选择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就要考虑到政府对不同的暴力和非暴力抵抗战术进行镇压的可能性和相对力度。假设一个人有足够的动机参加反对行动，<sup>23</sup> 那么问题就是：哪些行动更有可能招致严厉的镇压。因此，研究政府对发生在近期同等程度的暴力或者非暴力战术的镇压是否一样就十分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人们预期遭到镇压的可能性（坎宁安和博利厄，2010）。总之，非暴力纪律与镇压之间的预期关系如下：

**影响因素 12：**政府镇压暴力抵抗的频率和力度增加，非暴力纪律更好。政府镇压非暴力抵抗的频率和力度增加，非暴力纪律更差。

随着运动逐渐持续，破坏非暴力纪律的行为通常会变得更加普遍。如果运动不能很快实现自己的目标，参加者可能会对非暴力抵抗感到幻灭，对非暴力抵抗的偏好（ $b_{nv}$ ）就会降低，对暴力抵抗的偏好就会提高。这种由幻灭导致的偏好变化，可能会表现为暴力行动，也可能会表现为更加激进的意识形态。比如，在美国民权运动期间，持续了数年的非暴力行动之后，变革步伐太慢产生的幻灭感导致黑豹党等军事组织的兴起（加罗，1986）。最近在叙利亚，持续数月之久的非暴力行动未能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使反对派越来越多地转向暴力抵抗，使该国陷入内战（巴特科沃斯基和塔勒布，2015）。

**影响因素 13：**运动持续的时间越长，非暴力纪律就越难维持。

表2总结了上述所有对非暴力纪律的预期影响因素及其检验方法。这个预期影响因素清单虽然很长，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列举非暴力纪律理论的完整清单。笔者只是首次从已有文献中选择了一系列论点，将其纳入本书提出的理论中。在下一章将对这些关系进行统计检验，再下一章将进行案例研究，以便让读者理解，在这些预期影响因素中，哪些因素对非暴力纪律的影响最稳定。

---

<sup>23</sup> 分析一个人为什么选择参加或者不参加反对行动，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但是已有大量文献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本书的主题。有关个人为什么选择参加反对行动的经典著作，见蒂利，1978；利希巴赫，1995；伍德，2003。

表2. 需要检验的预期影响因素

	提高非暴力纪律的因素	检验方法
1	暴力和非暴力抵抗的历史经验	统计/案例研究
2	与非暴力抵抗运动有关的信息和培训	案例研究
3	非暴力抵抗战术的广泛性	统计/案例研究
4	外部政治环境对非暴力纪律的奖励	统计/案例研究
5	运动领袖呼吁非暴力纪律	案例研究
6	运动领导层强大、有凝聚力	统计/案例研究
7	战略目标稳健	统计/案例研究
8	做出避免对抗的战术选择	统计/案例研究
9	制定成员资格标准，把暴力分子排除在外	统计/案例研究
10	成员多样性程度高	统计/案例研究
11	运动对暴力行动进行处罚	案例研究
12	政府对暴力抵抗实施有差别的镇压	统计/案例研究
13	运动的持续时间	统计/案例研究

## 第二章 统计检验与结果

---

本章给出了前述非暴力纪律预期影响因素的统计检验结果。为了便于阅读，有关数据来源、检验方法和统计稳定性的技术信息，大多放在了正文后面的统计附录中。对这一部分内容感兴趣的学者，更适合阅读统计附录。对高级统计学不太熟悉的普通读者，本章较为通俗易懂。

正如序言中提到的，笔者统计检验使用的数据来自非暴力与暴力运动及其结果

(NAVCO) 3.0数据库(切诺韦思、平克尼、刘易斯，2016)。NAVCO 3.0收集了反政府运动采用的各种战术行动的详细信息，既包括非暴力抵抗运动发动的示威、罢工、抵制、静坐，又包括暴力起义发动的恐怖袭击和武装冲突。其详细程度对于了解非暴力纪律问题十分重要，它能让观察者看到每个行动的特征，而不是仅仅得出一场运动的模糊印象。

这些具体的数据，让我们能够了解政府对非暴力行动进行镇压或作出让步的模式等因素是怎样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比如，数据能够告诉我们：某国最近有多少起非暴力行动和暴力行动遭到了镇压或者赢得了让步。这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一场非暴力抵抗运动在各个时刻面临的政治机会和镇压风险。因此，本章收集了近年来遭到镇压和赢得让步的非暴力行动的平均数字。<sup>24</sup>

图2举例说明了最近5起政府对非暴力行动的镇压模式，从中产生某一类型行动的“平均镇压值”。如果最近5次非暴力行动中有3次遭到了镇压，说明现在将要进行的非暴力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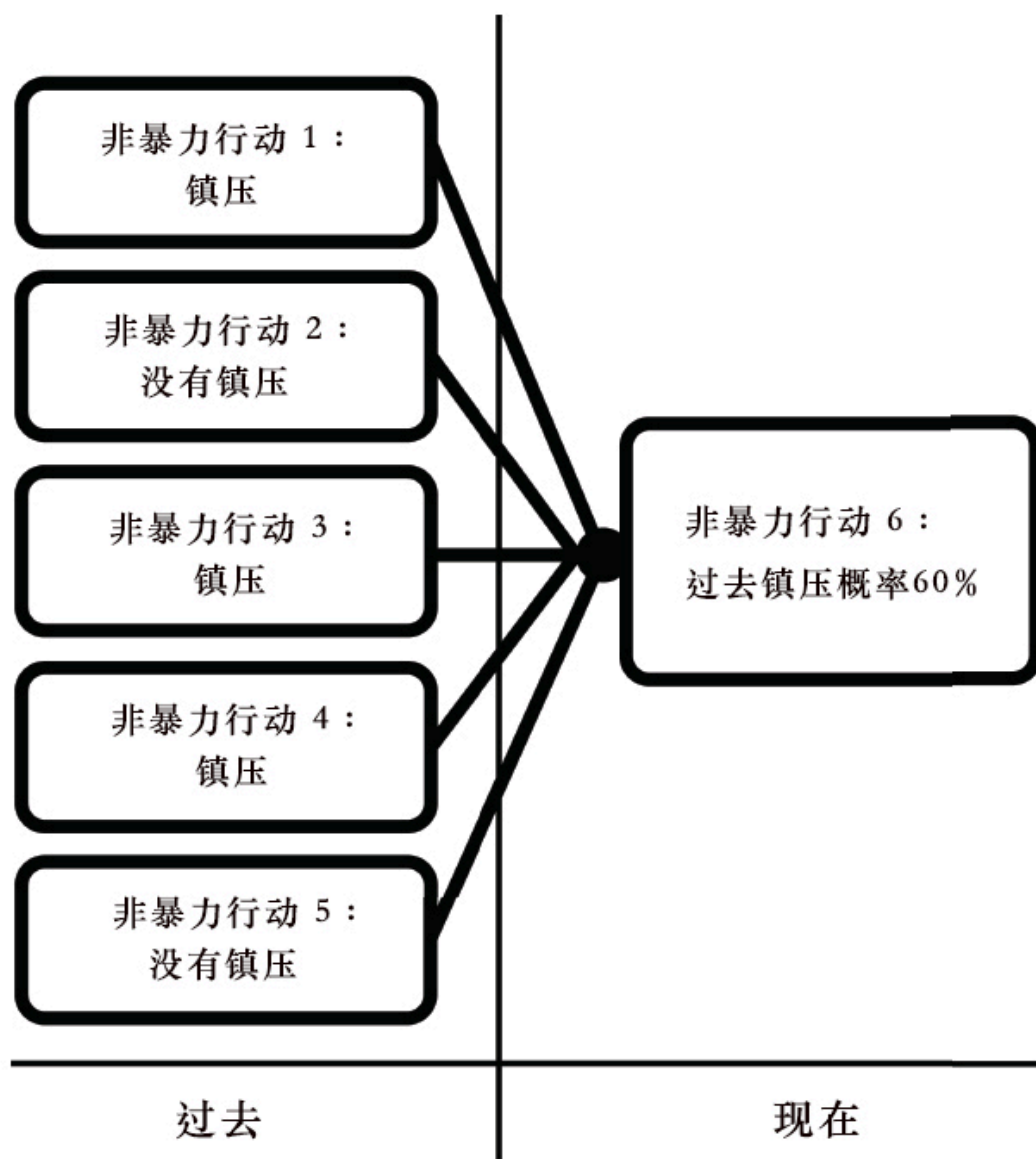
(图中标为非暴力行动6)的“过去镇压概率”为60%。前面影响因素12显示，这种镇压概率会增加原本保持的非暴力纪律在非暴力行动6期间下降的可能性。

---

<sup>24</sup> 镇压和让步模式是在过去发生的各项行动的不同数字之间取平均值。主要检验变量是最近 25 次非暴力行动遭到镇压或者赢得让步的平均数。详见统计附录。



图2. 举例说明过去镇压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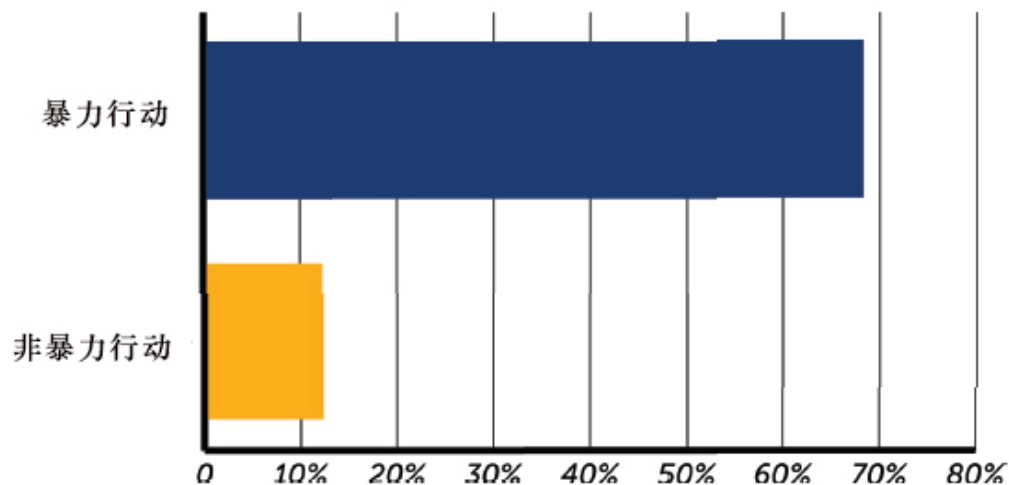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涵盖了1991-2012年期间，14个国家的数百个运动的数千起行动。<sup>25</sup> 虽然其中有些国家部分时间是民主体制，但是本书只关注非民主政权统治期间运动采取的行动。

本章试图确定，国家、运动或者特定行动的哪些特征与前一章提到的预期影响因素相符，有哪些特征会使一场行动可能成为非暴力行动、暴力行动或者“混合”了暴力和非暴力的行动。<sup>26</sup> 统计附录包含了这些数据是如何得出的细节。需要进行统计检验的非暴力纪律预期影响因素清单，见表2。

### 统计检验结果

对前述14个国家数据的初步检验显示，暴力和非暴力行动都与上一章所描述的许多预期影响模式相符合。比如，暴力行动比非暴力行动更有可能遭到镇压。政府镇压暴力或者“混合”暴力行动的概率是70%，而镇压非暴力行动的概率是12%。

图3. 行动遭到镇压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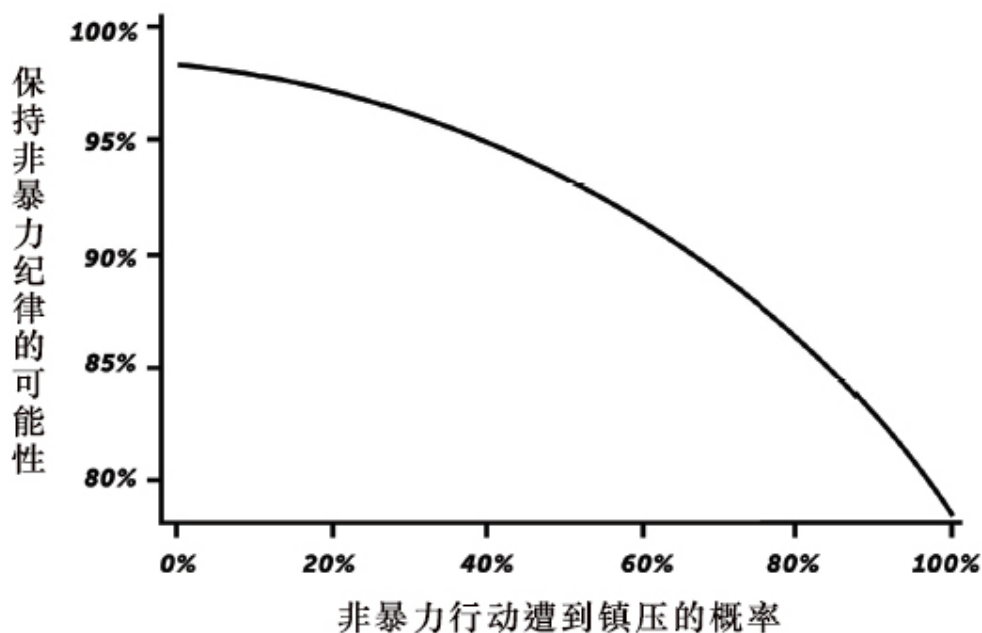
<sup>25</sup> 这14个国家是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肯尼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苏丹、突尼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也门。

<sup>26</sup> 比如一场非暴力示威，其中有些参加者与警方发生了肢体冲突，这就是一场“混合”的行动。

无论是对暴力行动还是对非暴力行动，政府都很少作出让步。但是，相对而言，政府更有可能对非暴力行动作出让步。政府对非暴力行动作出让步的概率是2.5%，而对暴力或者混合暴力行动作出让步的概率是0.5%。

这些镇压和让步模式与非暴力纪律有何关联？其中有一种关联是在大多数人预料之内的，即镇压越严厉，破坏非暴力纪律的可能性越高。随着非暴力行动遭到政府镇压的次数增加，破坏非暴力纪律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平均来看，在所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从最近若干次非暴力行动都没有遭到镇压，到最近所有非暴力行动都遭到镇压之后，运动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可能性会下降19%。<sup>27</sup> 这一关联非常符合理论的预期。镇压提高了非暴力行动的成本之后，人们就不再认为保持非暴力纪律有好处，人们就更有可能会选择暴力行动。

图4. 镇压对非暴力纪律的影响



<sup>27</sup> 有关如何获得这些预测概率的更多信息，见统计附录。主要统计检验使用的方法，是计算最近 25 次非暴力行动遭到镇压的百分比。

图4用图形描述了镇压与非暴力纪律的关系。随着近期非暴力行动遭到镇压的百分比上升，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可能性会从98%下降到79%。

图4数据显示，这一关联更多源于运动的参加者对长期暴力镇压模式做出的反应，而不是对某一次特定暴力镇压做出的反应。换句话说，一个非暴力行动是否遭到镇压，对它是否会保持非暴力纪律没有显著影响。但如果长期暴力镇压的水平不断上升，参加者选择暴力行动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还有一种关联是在大多数人预料之外的，即政府曾经向非暴力行动让步，不仅不会加强非暴力纪律，反而更有可能破坏非暴力纪律。在过去25次非暴力行动中政府从完全没有让步到最大的让步，会使运动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可能性下降40%。<sup>28</sup>

这一数据过于宽泛，没有具体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情况出现。各种原因可能都有，其中包括：第一，政府的让步可能使运动“居功自傲”，换句话说，得到某些让步，可能会使运动领袖过于自负，让他们失去工作的重点。在实现了某些战略进展之后，运动可能会减少培训的力度，放松成员资格标准或者其他保持非暴力纪律的严格措施。政府的让步，还可能会抑制人们对于不公的愤怒（这种情绪往往会使运动团结一致），导致运动分裂并破坏非暴力纪律（马丁，2007，3）。<sup>29</sup> 从民族自决争端中获得的证据显示，和解可能导致运动的分裂加剧——从温和派中分裂出激进的团体，使用暴力手段追求更加激进的目标（坎宁安，2013，2014）。

历史经验对非暴力纪律的影响是意料之中的，但对所有行动而言，这一因素在统计数据上不显著。然而，如果只考虑追求政权更迭或者领土分离的重要运动，历史经验确实能够对非暴力纪律产生预期的影响——过去的非暴力运动取得成功，现在的非暴力纪律水平就会较高，过去的暴力运动取得成功，现在的非暴力纪律水平就会较低。<sup>30</sup>

---

<sup>28</sup> 更多信息，见统计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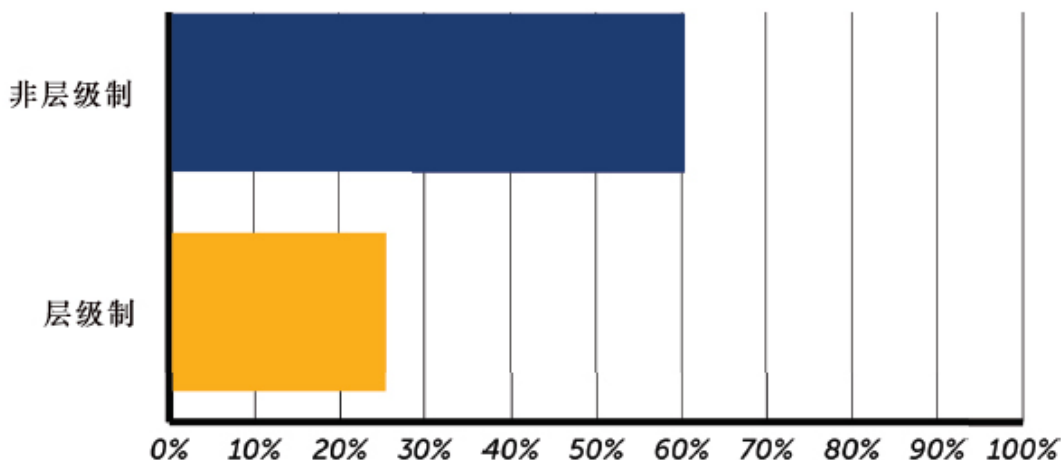
<sup>29</sup> 感谢布赖恩·马丁提出这种可能的原因。

<sup>30</sup> 从理论上讲，带有革命性目标的运动应该包含反侵略运动（切诺韦思和斯蒂芬，2011），但是本项目未采用这一通常的归类方法，而是将反侵略运动单独归为一类。



运动内部的因素，对非暴力纪律的影响不显著。尤其是运动的多样性与非暴力纪律的关系很少或者没有。主要由年轻人或者学生参加的运动与非暴力纪律之间的关系也不显著。但是，是否存在层级制的领导结构，和领导层在目标和战略方面是否存在明显的内部分歧，对运动是否能保持非暴力纪律有显著影响。层级制会使运动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可能性降低35%。领导层在目标和战略方面分歧高的运动，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可能性会提高28%。

图5. 运动的组织结构与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可能性



过去的文献里没有运动层级制对非暴力纪律有消极影响的记录，笔者对这一发现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马蒂尼曾经提出，当运动的参加者对运动要采取的行动有更大的主导权的时候，运动的非暴力纪律会更好。另外，根据笔者的理论，层级制能够提高运动领袖对破坏非暴力纪律的成员进行处罚的可能性、即时性和力度（数学模型中的 $p_v$ 和 $s_v$ 因素），但也可能会减少个人从保持非暴力纪律中获得的利益。因为运动的参加者可能会感到自己对运动缺乏主导权（ $b_{nv}$ 因素）。另外，反政府运动可能天然会吸引那些具有反叛精神的参加者，这些人更不愿遵从层级制，如果有人命令他们维持非暴力纪律，可能会适得其反。<sup>3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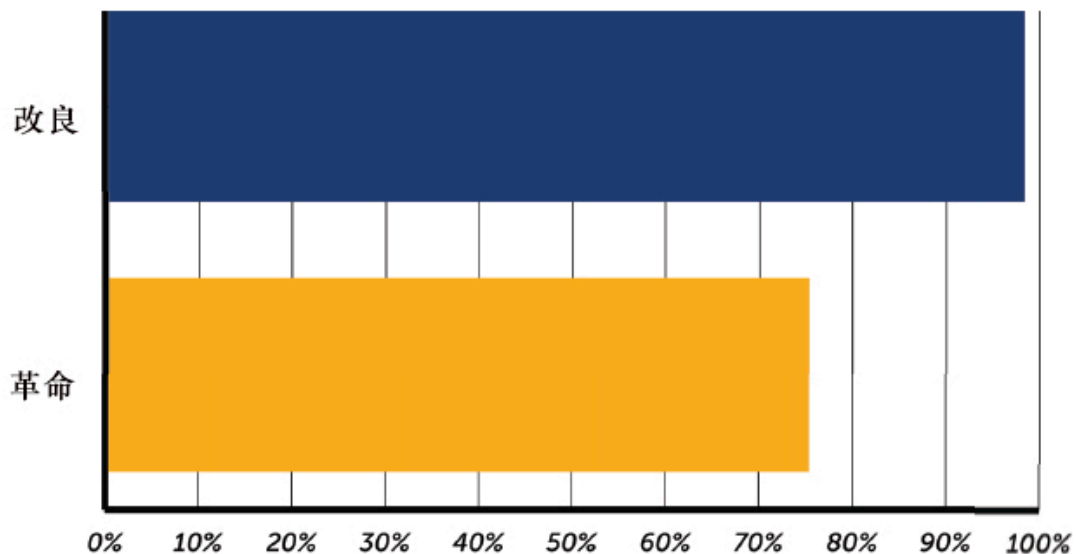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更加深入地发掘数据，会发现内部分歧的情况更加复杂。数据中几乎所有的行动，都发生在那些或者没有发现有内部分歧，或者只有适度的不团结（比如有意识形态或者政策方面的分歧）存在的运动中（切诺韦思，2015）。因此，笔者在统计分析中观察到

<sup>31</sup> 感谢埃里卡·切诺韦思提出这一观点。

的重要差异是：存在某些公开的、明显分歧的运动较少破坏非暴力纪律。虽然公开的明显分歧可能意味着运动缺乏团结，但是也可能意味着运动允许健康的辩论，这能够让参加者感到自己从运动中获益。运动中有多个声音，可能意味着有许多不同的派别都认同自己是运动的一部分，自己为运动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这会激励人们更强的保持非暴力纪律（提高 $b_{nv}$ 因素）。另一方面，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完全一致的运动，可能并没有消灭内部分歧，只是把内部分歧隐藏得更深了。这些分歧如果没有出现在运动内部的讨论中，就有可能表现为运动参加者的暴力行动。

运动的另一个特征——运动的目标，似乎对非暴力纪律有显著影响。运动如果有着政权更迭或者领土分离的革命性目标，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可能性就会下降22%。镇压程度上的差异似乎不能解释这一变化。虽然有着革命性目标的运动更有可能遭到镇压（革命性目标的运动有29%遭到镇压，改良性目标的运动有12%遭到镇压），但是即使镇压程度相同，革命性目标的运动也更难保持非暴力纪律。虽然可能有其他的解释，但是认为非暴力纪律的削弱与革命性目标有关，应该是合理的。

图6. 战略目标与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可能性



虽然效果方面存在某些不一致，但是运动的持续时间似乎对非暴力纪律也有影响。用运动持续的时间来预测非暴力纪律的高低，在多数统计分析中都非常显著。换句话说，运动持续的时间越长，行动就越有可能变得暴力。不过，这一关系不是在所有统计分析中都很明显，这意味着，运动持续时间对非暴力纪律的影响是不一致的。

有关示威或者静坐之类的身体对抗战术是否更容易导致非暴力纪律遭到破坏，统计分析也不太明显。这可能是由于数据库造成的问题（更多信息见统计附录），但是，通过多重检验，笔者发现了数据中的这一关联，即具体的战术与保持非暴力纪律之间的关系很小或者没有。一些微弱的迹象显示，与示威或者静坐相比，罢工比较不容易破坏非暴力纪律，但是这一关联在统计分析上也不明显。

这一结果支持了与镇压的作用有关的结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参加者是对更大的政治环境提供的刺激做出反应，而不是仅仅对直接的镇压做出反应。身体对抗性较强的战术（容易让人们情绪激动），并不比身体对抗性较弱的战术更有可能破坏非暴力纪律。这并没有否定以下可能性：在特定的情况下，情绪反应可能会驱使人们破坏非暴力纪律。不过，这种本能反应并不是破坏非暴力纪律的主要途径。

根据前一章提出的理论框架，统计检验强烈支持了个人对暴力和非暴力行动偏好( $b_v$ 和 $b_{nv}$ 因素)的重要性，以及镇压( $r_v$ 和 $r_{nv}$ 因素)对加强和削弱非暴力纪律的影响。害怕受到运动的处罚是否能够让人们保持非暴力纪律，统计检验也不明显。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实施处罚和告诉人们哪些行为会受到惩罚（层级制和内部团结），并不能促进非暴力纪律，反而与破坏非暴力纪律明显相关。由于这一检验结果不是直接产生的，因此不能排除运动的处罚或奖励能够促进非暴力纪律的可能性，但是有关检验确实让笔者怀疑这一可能性。

表3总结了主要的统计检验结果。

表3. 统计检验结果

暴力和非暴力行动的历史？	整体影响不明确，但可能会对有着革命性目标的大规模运动的非暴力纪律有影响。
历史上非暴力抵抗战术的广泛程度？	没有显著影响。
外部政治环境/让步？	与预期影响相反。政府向非暴力抵抗运动让步会带来破坏非暴力纪律的行为。
运动领导层强大、有凝聚力？	与预期影响相反。层级制、团结统一的运动非暴力纪律较差。
目标稳健	产生了预期的影响。目标稳健的运动非暴力纪律较好。
避免对抗性的战术选择？	有微弱的迹象显示，使用身体对抗性战术的运动非暴力纪律较差，但结果不明确。
参加者的多样性？	没有显著影响。
镇压？	产生了预期的影响。提高对非暴力行动的镇压水平会导致非暴力纪律下降。
成员资格标准	有微弱的迹象显示，年轻人参加的行动非暴力纪律较差，但结果不明确。
运动持续时间？	持续时间长的运动，后期的行动非暴力纪律较差，但这一关系存在某些不一致性。



### 第三章 “颜色革命”比较

---

本章以统计检验的结果为基础，还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某些用统计数据无法检验的非暴力纪律预期影响因素，并且有结构、有重点地比较了三个有影响的非暴力抵抗案例：

- 2000年塞尔维亚的“推土机革命”。
- 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
-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

这3个案例都发生在21世纪初期，是“后共产主义国家”非暴力抵抗运动浪潮的案例，被称为“颜色革命”。这一浪潮通常还包含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本章之所以没有讨论乌克兰的案例，是因为前一章的统计检验中已经包含了乌克兰案例的数据。

这三个案例是用“最类似个案比较系统”的方法选择出来的，也被称为密尔“差异研究方法”（密尔，1856）。这种案例研究选择方法试图复制受控实验的条件，选择许多条件都相似，只在研究者感兴趣的方面（在本例中是非暴力纪律水平）有所不同的案例。

之所以选择“颜色革命”的案例，而不是选择其他非暴力抵抗“浪潮”中的类似案例，有如下理由：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如表4所示，这些案例在非暴力纪律方面显示出明确的差异。第二，这些案例所在国家发生的事件没有纳入本书的统计数据中。第三，选择时间上较近的案例，而不是选择较早的案例——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的反共产主义运动——目的在于让笔者的分析与今天的非暴力抵抗实践者有更直接的关系。第四，“颜色革命”的案例采用了类似的非暴力战略，这一革命“浪潮”早期运动（尤其是塞尔维亚的“欧特珀”学生运动）的活动家有意识的与邻国的活动家分享非暴力抵抗的经验。这三个案例在地理和文化上的相似性，促进了这一模式的传播和模仿，使这三个案例在非暴力纪律方面的差异更值得研究。

表4. “颜色革命”简要对比

国家、日期	运动	非暴力纪律水平
2000年，塞尔维亚	欧特珀运动/推土机革命	以非暴力为主
2003年，格鲁吉亚	玫瑰革命	几乎完美的保持了非暴力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	郁金香革命	勉强保持了非暴力

分析这些案例的时候，笔者使用乔治和班尼特（2005）的过程追踪方法，进行了有结构、有重点的比较。也就是说，案例研究关注每个案例中，非暴力纪律的预期影响因素的具体构成；分析各个影响因素存在或者缺席的程度；具体追踪从出现影响因素到出现非暴力纪律加强或者削弱的结果的过程，以此确定每个影响因素的具体效果。

本章简要概述了每个案例的主要事件，突出了与非暴力纪律水平有关的证据，以及运动和国家与非暴力纪律的预期影响因素有关的特征。简要叙述之后，本章还讨论了各个案例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并且提供了相关证据。<sup>32</sup>

### 塞尔维亚：要推土机不要子弹<sup>33</sup>

20世纪90年代，反对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政权的民主运动持续发展，这场运动始于1991年的学生示威。在南斯拉夫从6个共和国组成的联邦逐渐解体为一个较小的残存国家的过程中，运动一直在继续。

<sup>32</sup> 由于下文案例摘要中的许多事件，或者是众所周知的，或者涉及多个信息源，因此本章不再按部就班地提供文内引用。本书结论部分的参考文献清单中有一个专门的部分，其中列举了笔者为案例研究而查阅的主要资源。

<sup>33</sup> 反对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运动通常被称为“推土机革命”，因为在运动的最后几次抗议中，活动家用推土机推倒了警方的路障。

1996年的地方选举成为反对运动的主要节点。反对派在多场地方选举中大获全胜，但是米洛舍维奇的执政党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引发了4个月的民众抗议。在发生了严重的暴力镇压和流血事件之后，双方各有胜败。米洛舍维奇承认反对派在多场地方选举中获胜，但是他继续掌权。

最终成功地推翻了米洛舍维奇政权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是1998年由一群大学生——其中许多人参加过1996年的抗议活动——共同组建的“欧特珀”组织（塞语意为“抵抗”）。这个学生组织有一个明确的革命性目标：推翻米洛舍维奇。他们采取的方法是通过选举和有计划的非暴力运动，以确保真实的选举结果得到尊重。“欧特珀”最初的行动很小，但是很机智：利用街头表演和幽默来破坏米洛舍维奇政权的权威，吸引了民众的兴趣。

“欧特珀”和塞尔维亚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从国际社会获得了大量的财政资助和实际支持，“欧特珀”的主要活动家都接受了非暴力抵抗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培训。“欧特珀”和其他反对派活动家还接受了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的活动家的培训和援助。在塞尔维亚的“推土机革命”之前，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的反对派通过选举击败了威权的统治者。



2001年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附近的一个“欧特珀”组织的标志

照片来源：维基共享





塞尔维亚地图



米洛舍维奇政权一直在镇压“欧特珀”运动。警方经常逮捕、威胁或者殴打“欧特珀”的活动家，多次指控该组织为从事颠覆活动的恐怖主义团伙。早期的“欧特珀”运动大体上保持了非暴力纪律，很少有暴力事件的记录。米洛舍维奇政权的暴力镇压，和“欧特珀”活动家的非暴力纪律，成功地使民众舆论转而反对米洛舍维奇，因为人们认为，暴力镇压学生标志着政权的虚弱和残暴。创新的战术和米洛舍维奇政权的暴力行为导致的反作用，帮助“欧特珀”迅速成长。最终，全国各地分会中的“欧特珀”成员数以万计。在运动到达顶峰的时候，运动的参加者在各个维度上都具有多样性。

2000年，总统米洛舍维奇宣布，塞尔维亚将于当年9月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在“欧特珀”的努力下，18个反对党组成了联合阵线“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DOS），开始策划利用选举推翻米洛舍维奇。他们预计米洛舍维奇会通过操纵选举窃取选举结果，他们计划通过在全国进行选举监督来揭露舞弊行为，并且强制执行选举结果。采用的方法是呼吁民众起来抗议，直到米洛舍维奇下台。

在第一轮投票中，虽然米洛舍维奇承认自己没有获胜，但是他宣布，反对派候选人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也未能赢得多数选票，需要举行决选。然而，反对派的独立计票显示，科什图尼察已经在选举中赢得了绝对多数。

在第一轮投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联盟制定了一个推翻米洛舍维奇的战略。他们号召举行总罢工，并且计划在10月5日让整个塞尔维亚农村地区的支持者聚集到贝尔格莱德，造成政府瘫痪。在计划会议上，“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联盟的领导层“一致决定，要对警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布约舍维奇和拉多瓦诺维奇，2003）。虽然他们在许多公开讲话中仍然强调公民不服从，但他们也准备了武器，并建立了一个配备武器的“任务小组”，由退役军人或警察领导，负责保安工作，以及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对付警察或军队的暴力行为。但是，由于非暴力抗议取得了成功，他们的武器从未派上过用场。

10月5日之前的几天里，参加总罢工的最重要的团体是贝尔格莱德郊外科卢巴拉煤矿的矿工。由于这个煤矿提供的电力在塞尔维亚占有很大比例，所以罢工导致了大规模断电。罢工组织得一丝不苟，工人占领了煤矿，搬走了重要的机器设备，以防破坏罢工的人重新开工。

10月4日晚上，“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联盟的领导人会见了保安部队的重要负责人。保安部队中的许多人都不愿意为米洛舍维奇政权卖命，但是又担心反对派实施暴力行为。于是，“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联盟与保安部队达成若干非正式协议，承诺抗议者将保持克制，以换取保安部队的克制。

10月5日，全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联盟的支持者开始向首都贝尔格莱德行进。政府方面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塞尔维亚警察将贝尔格莱德市围成了一个大圈，路障处却只有几支小分队。这些小分队遇到了大量的反对派支持者，他们要求警察让开。这一过程中，非暴力纪律良莠不齐，有些抗议者和平通过了路障，另一些抗议者则使用了身体暴力或威胁迫使警方让开。

在贝尔格莱德，警方和抗议者之间也发生了几起暴力冲突，有些冲突还使用了简易武器。不过，虽然政府命令警方使用火箭筒和自动武器阻止抗议者进入贝尔格莱德，但是警方不愿卷入激烈的暴力冲突。虽然双方都拥有武器，但是抗议者大体上服从了“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联盟的决定，只使用了与警方类似程度的暴力回应警方。警方用警棍和催泪瓦斯袭击抗议者，抗议者则用石块、瓶子和拳头反击，几乎没有发生交火。双方的整体暴力水平在范围和性质上都是有限的，尤其考虑到是在数以十万计涌入首都的抗议者中保持非暴力纪律的整体规模 and 水平。

为了避免暴力，“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联盟和“欧特珀”的领袖进行了大量的协调工作，他们呼吁抗议者保持克制，不要袭击警察，并且亲自干涉，以防袭警行为太过火。

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抗议者占领了塞尔维亚议会、国家电视台和警察局。警方和国家安全特种部队的许多人支持或者加入了反对派，拥有武装的“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民兵组织守卫着贝尔格莱德的重要地点。军队不愿向抗议民众开火，大多置身事外。10月6日，科什图尼察与米洛舍维奇举行谈判，米洛舍维奇被迫承认选举结果。

因此，对“推土机革命”最准确的描述是“以非暴力为主”，参见表4。对“欧特珀”持续了数年之久的运动可以描述为“几乎完美保持了非暴力纪律”。虽然最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时候发生过破坏非暴力纪律的事件，但其范围和强度都非常有限。因此，我们可以称“推土机革命”以非暴力为主，表现出了高度的非暴力纪律，尽管并不完美。

## 格鲁吉亚：议会中的玫瑰

2003年，格鲁吉亚政府准备举行议会选举。由于普遍腐败和经济困难，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支持率越来越低。曾经分裂成若干不同政党的格鲁吉亚反对派看到了在议会中赢得更多席位的可能性。

相对于从苏联争取独立时大体和平的行动，格鲁吉亚独立之后的短暂历史中充斥着可怕的内部冲突。就在格鲁吉亚走向独立的同时，南奥塞梯地区发动了一场争取从格鲁吉亚获得自治权的血腥战斗，随后又发生了阿伯卡茨地区争取独立的斗争。更为重要的是，1991年底对反政府抗议示威的暴力镇压，使格鲁吉亚保安部队发生了分裂，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力量在首都第比利斯街头发生了激烈的巷战。格鲁吉亚独立之后的第一位总统兹维亚德·加姆萨胡尔季阿被谢瓦尔德纳泽领导的政变推翻。兹维亚德·加姆萨胡尔季阿的支持者和谢瓦尔德纳泽的支持者发动了一场血腥的内战，直到1993年才结束。



格鲁吉亚地图



2001年，时任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因为企图关闭一家独立电视台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迫使他放弃了关闭电视台的做法。与此同时，曾经担任司法部长的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从政府中辞职，组建了反对派团体“民族联盟运动党”（UNM）。萨卡什维利是一个年轻而且有领袖魅力的政治人物，他承诺将实施重大的经济改革。

萨卡什维利和“民族联盟运动党”的其他领袖，以及青年抵抗组织“卡玛拉”（意为“受够了”）的成员，都深受2000年塞尔维亚“推土机革命”的启发。萨卡什维利多次前往塞尔维亚接受培训。“卡玛拉”的年轻成员明确表示要以“欧特珀”为榜样，“欧特珀”的学生领袖也前往格鲁吉亚，与他们一起组织“非暴力抵抗夏令营”（邦斯和沃齐克，2011，161）。

在2003年选举之前的准备阶段，萨卡什维利和其他反对派领袖们遭到了保安部队的暴力骚扰，他们向运动发出警告：政府很有可能篡改选举结果。当选举显示，谢瓦尔德纳泽的政党和一个政府的“花瓶党”——由地方强人领导的联合政党联盟——有可能赢得议会选举时，萨卡什维利和反对派立即谴责选举结果舞弊，呼吁格鲁吉亚人民举行和平抗议，推翻政府。



2003年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议会大厦前的抗议人群

照片来源：维基共享



在选举舞弊事件发生之前，运动的目标是在格鲁吉亚议会中赢得更多席位。但是，当政府选举舞弊行为公开化之后，运动的目标很快转变为彻底推翻谢瓦尔德纳泽政权。

谢瓦尔德纳泽政权和反对派都警告民众，对手有发动暴力事件的危险，他们发出的警告引起了人们对1990年代初内战的回忆。谢瓦尔德纳泽企图利用发生内战的危险阻止民众参加抗议示威，他警告说，反对派一定会把格鲁吉亚拖入内战之中。另一方面，反对派则不断强调，运动斗争的方法完全是和平的。萨卡什维利反复呼吁运动的支持者保持非暴力，他说，即使是轻微的破坏非暴力纪律，也会给政府提供“挑衅的理由”（迈登斯，2003）。“卡玛拉”的活动家也努力通过与士兵交朋友来促进非暴力纪律，降低镇压和暴力升级的风险。

运动展现出巨大的战术灵活性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最初的非暴力行动是在议会大楼前长期静坐，但是，随后运动的支持者开始了抗议游行，游行队伍向总统府进发的过程中，反对派领袖发现对抗威胁有可能升级，于是，他们取消了静坐，替代方案是敦促运动的支持者参加抗税和其他各种形式的不合作行动。

**当对抗的威胁升级时…反对派领袖取消了静坐，替代方案是呼吁支持者参加抗税行动。**

2003年11月底，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宣布，谢瓦尔德纳泽获胜，抗议重新开始，并且在全国迅速升级。保安部队拒绝镇压抗议行动，谢瓦尔德纳泽的高层助手纷纷辞职，萨卡什维利带领一群抗议者进入议会大厦，打断了谢瓦尔德纳泽发表的就职演说。抗议者手持玫瑰，以表明自己的非暴力意图，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运动因此被命名为“玫瑰革命”。

谢瓦尔德纳泽逃离了议会大楼，并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保安部队拒绝服从命令。谢瓦尔德纳泽的两大支持者美国和俄罗斯都呼吁和平解决冲突。经过俄罗斯的斡旋，谢瓦尔德纳泽同意辞职。随后举行了总统和议会选举，反对派不仅赢得了议会多数席位，萨卡什维利还当选了总统。

在“玫瑰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很少出现破坏非暴力纪律的行为。正如表4对这场运动的准确描述，运动几乎完美地保持了非暴力纪律。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存在某些轻微的违背非暴力纪律的现象，但是整体来看，参加者在运动期间一直保持了非暴力。

## 吉尔吉斯斯坦：流血的郁金香

吉尔吉斯斯坦的抗议始于2005年初议会大选的预备阶段。2003年格鲁吉亚和2004年乌克兰发生的非暴力抵抗运动，震撼了长期担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的阿斯卡尔·阿卡耶夫。阿卡耶夫反复警告反对派：任何在街头反对政府的企图，都可能立即带来内战和种族战争。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初的政治动荡，曾经导致该国南部多数民族吉尔吉斯族和少数民族乌兹别克族之间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



吉尔吉斯斯坦地图

从那以后，阿卡耶夫政权基本上没有遭遇过大规模的反对运动。经济自由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府的经济精英阶级，其中许多人通过选举进入了议会。2002年，反对派议员阿兹别克·贝克纳扎罗夫在阿克萨地区发动示威、罢工，设置路障，反对政府在领土争议问

题上对中国让步，遭到逮捕。反对派随即在首都组织抗议示威，要求释放阿兹别克·贝克纳扎罗夫。

安保部队对抗议群众进行镇压，杀死了5名抗议者。政府声称，示威演变成暴力事件之后安保部队才进行干预的，但反对派反驳说，政府镇压的是手无寸铁的和平抗议者。虽然运动以镇压告终，但也赢得了政府的让步，阿兹别克·贝克纳扎罗夫被判缓刑后获释。

舆论普遍认为，2005年3月的议会大选，是为当年早些时候的总统大选做准备。总统任期限制要求阿卡耶夫在大选后下台，但反对派声称阿卡耶夫企图继续控制权力，采用的方法是通过舞弊手段让他的支持者进入议会，并且把他的子女安排到重要职位上。

格鲁吉亚“玫瑰革命”的领袖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提供了培训。吉尔吉斯斯坦的学生也模仿“欧特珀”、“卡玛拉”、“波拉”（分别是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青年组织），组成了反对阿卡耶夫政权的学生组织“凯尔克尔”。但是，与“欧特珀”和“玫瑰革命”领袖接受的深度培训相比，“凯尔克尔”的培训似乎很有限。

抗议示威发动于实际选举之前，不同地区（主要是南方）的反对派领袖动员支持者走上街头，要求政府结束压制选民和其他操纵选举的方式。这些最初的抗议活动是分头进行的，重点聚焦在本地的议题，并没有推翻阿卡耶夫政权的革命性目标。抗议大体上是和平的，也没有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

重要的转变发生在南部两个州的首府贾拉拉巴德和奥什，抗议者从街头抗议转向占领各自城市的政府大楼的时候。这些占领行动至少有一部分使用了武力，警方大体上没有抵抗。就在这些高调行动开始吸引舆论注意力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反对派领袖也开始迅速会面协调行动，以表达全国性的诉求。

这整场运动表现出了高度的组织性。从最初的抗议示威开始，反对派领袖就动员和组织了自己的支持者，精心规划了有关行动，还组织了纠察队保护示威者，维持秩序。在把最初各地的抗议活动组织成一场全国统一运动的同时，反对派还利用传统的权力结构，在全国创建了很多层级制的支持团体。

非暴力行动自始至终都显示了高度的多样性。虽然阿卡耶夫总统曾经谴责运动释放出种族冲突的幽灵，但运动很快吸收了该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乌兹别克族的领袖的参与。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在性别、年龄、党派和其他各个维度上都具有多样性。有证据显示，“郁金香革命”几乎代表了吉尔吉斯斯坦所有主要的选民群体。

反对派领袖呼吁抗议者保持克制，不要使用暴力。有些抗议者也手持鲜花（先是郁金香，然后是水仙花）象征和平的意愿（沃尔什，2005）。但是，有些反对派领袖虽然敦促支持者保持和平，但也威胁说，一旦安保部队进行镇压，就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最初暴力事件的规模很小，常常是喝醉的抗议者在抗议示威中发生的各种混战。重要的暴力升级发生在警察驱散占领贾拉拉巴德和奥什政府大楼的抗议者的时候。占领者进行了反击，双方各有伤亡。在接下来的一天中，抗议者用暴力将警察从大楼驱赶出去，造成了一些人死亡，许多人受伤，抗议者还捣毁了贾拉拉巴德的警察局。

就在反对派开始夺取南部地区控制权的时候，有些反对派领袖宣布，要让阿卡耶夫下台。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抗议者开始在政府所在地“白宫”大厦前举行抗议示威。

3月24日，反对派支持者聚集到“白宫”外面。有报道说，当一个由年轻的抗议者组成的“先锋队”，带着棍棒和木制盾牌企图攻进“白宫”时，与警方和数百名没穿制服的阿卡耶夫的支持者发生了激烈冲突。战斗持续了数小时，由于反对派支持者的数量大大多于部署在“白宫”外面的警察和阿卡耶夫的支持者，最终，反对派支持者冲破了警方的防线，砸碎了玻璃，占领并且洗劫了“白宫”。丢失了该国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政府所在地也落入反对派之手后，阿卡耶夫逃出该国，并于10天后宣布辞职。

有证据显示，吉尔吉斯斯坦的示威者大多数保持了和平，然而，整个运动过程中一直都存在着赤手空拳的暴力冲突，因此，对“郁金香革命”最恰当地描述是：非暴力纪律非常低，或者“勉强保持了非暴力”。

表5. 案例研究对比的主要结果

	格鲁吉亚		塞尔维亚		吉尔吉斯斯坦	
影响因素	相关性	作用	相关性	作用	相关性	作用
斗争历史	有	过去的内战使人们保持了非暴力纪律	有	过去的冲突使警方避免采取镇压行动	有	帮助避免了种族暴力，但对非暴力纪律没有帮助
信息/培训	有	培训帮助反对派团体保持了非暴力纪律	有	对核心人物有效，对更大的人群无效	有	没有明显效果
过去非暴力抵抗战术的广泛程度	无	过去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有	过去使用过的战术范围很广，但没有完全遵守非暴力纪律	无	过去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有利的外部环境	有	之前的抗议带来了某些让步	无	之前的抗议遭到镇压	不一	之前的抗议遭到镇压
呼吁非暴力纪律	有	呼吁始终如一，有所帮助	混合	标准不明，带来冲突	无	领袖鼓励了某些暴力行为
层级制领导	有	鼓励了非暴力纪律	有	呼吁只对暴力作出回应	有	鼓励了暴力
目标稳健	无	革命性目标没有导致暴力	无	革命性目标导致了某些暴力	有	有了革命性目标之后，暴力增加了



使用避免对抗的战术	有	避免了冲突	混合	身体对抗过程中发生了暴力	无	“守卫领土”导致了暴力冲突
成员资格标准	不明	没有相关证据	混合	运动变成群众运动之后，非暴力纪律被破坏	无	招募了决心从事暴力行动的年轻人
参加者多样性	有	没有明显效果	有	没有明显效果	有	没有明显效果
运动的处罚	无	没有重大的违反非暴力纪律的行为	有	领袖把混战的人分开，并且加以谴责	无	领袖鼓励暴力
镇压	很少	没有重大的镇压行动	混合	暴力遭到了警方的镇压	有	警方的镇压造成了主要冲突
运动持续时间	无	没有重大的暴力事件	有	运动后期发生了暴力事件	有	运动中后期发生了暴力事件

# 第四章 案例研究分析

---

从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案例中获得的证据，是怎样支持或者削弱非暴力纪律的各种预期影响因素的？上一章的表5总结了案例研究的结果，本章将通过在第一章讨论过的13个预期影响因素对这三个案例进行比较，并分析每个案例的发展过程增加还是削弱了非暴力纪律。

## 历史经验

在上述三个案例中，发生暴力冲突的历史经验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塞尔维亚，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造成的战争阴影不仅仍然笼罩在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和“欧特珀”成员的心头，更重要的或许是，保安部队也对这一历史经验记忆犹新，他们担心民众的抵抗会得到北约的军事支持（布约舍维奇和拉多瓦诺维奇，2003，11）。在格鲁吉亚，1990年代初，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和谢瓦尔德纳泽的支持者之间发生的内战，以及阿布哈兹地区和南奥塞梯地区的分离主义者造成的冲突，也促使双方保持了极大的克制。1990年代初格鲁吉亚从苏联争取独立的和平运动，也证明了非暴力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在吉尔吉斯斯坦，1990年代初的种族冲突记忆，促使反对派很快与乌兹别克族人一起组成了反对阿卡耶夫的联盟。

这三个案例的非暴力纪律水平，与这些国家历史上发生的暴力冲突的区域和严重程度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吉尔吉斯斯坦，1990年代的种族冲突发生在边远地区，没有影响到政府对国家的控制权。在塞尔维亚，虽然1990年代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对南斯拉夫仍然具有现实的威胁，但是在塞尔维亚内部，冲突一直限制在较低的程度，塞尔维亚的反对派也没有用武装斗争来反对政府。而在格鲁吉亚，内战对整个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首都第比利斯街头发生了武装冲突，并且出动了坦克等重型武器。所以，历史上暴力冲突发生在中心区域的残酷程度，可能会反过来加强非暴力纪律。

## 与历史上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有关的信息和培训

与过去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有关的培训和信息，似乎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在保持非暴力纪律方面效果不一。在这三个案例中，运动领袖都接触到了大量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信息，也接受了非暴力抵抗方面的培训。尤其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由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运动刚刚取得了成功，反对派可以借鉴这些与他们国家相似的经验。但是非暴力抵抗方面的培训，以及不久前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在非暴力抵抗方面取得的成功，并没有促使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把非暴力纪律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培训的质量，以及运动的领袖从最近的经验中学到的具体内容。虽然吉尔吉斯斯坦的运动领袖确实接受过培训，但培训的深度相当有限。这与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的案例形成了对比，后两个国家的非暴力抵抗培训既广泛又详尽。由于培训的有限性，“郁金香革命”的领袖可能对非暴力行动的原理没有非常深入的理解。他们对战术的选择似乎主要出自本能，以及对之前“颜色革命”国家成功经验的粗浅认识，即推翻独裁者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要有大量的抗议者走上街头就行了。对于非暴力抵抗的原理，比如非暴力纪律的重要性，他们理解得很浮浅，实施得也很浮浅。因此，在这些案例中，接触过去非暴力斗争信息和接受非暴力抵抗培训的作用，会受到这些信息和培训质量的影响。

## 历史上使用过的非暴力抵抗战术

在这三个案例中，过去是否存在广泛的非暴力抵抗战术，影响并不一致。之前使用过的战术最多的国家可能是塞尔维亚，该国过去的反对运动和“欧特珀”持续数年的创新活动，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复杂、全面、种类繁多的非暴力抵抗战术。但是，战术多样性并没有使他们有比格鲁吉亚更高的非暴力纪律。虽然格鲁吉亚人从自己国家的历史经验中获得的非暴力抵抗战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都少得多，但他们却保持了近乎完美的非暴力纪律。

### 历史上的政治让步

虽然政治让步对非暴力纪律产生直接影响的证据不十分明确，但是，长期来看，政治让步似乎与较高的非暴力纪律水平有关。在格鲁吉亚和塞尔维亚，过去的非暴力运动都曾经带来过某些让步：1996年的抗议示威之后，米洛舍维奇承认了反对派在地方选举中赢得的胜利；2001年的抗议之后，谢瓦尔德纳泽放弃了关闭一个独立电视台的做法。相反，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克萨运动虽然成功地使贝克纳扎罗夫获得了自由，但是也遭遇了严厉的镇压。

政治让步与非暴力纪律的关联在案例研究与统计检验中的结果正好相反：统计检验的结果显示，让步与破坏非暴力纪律的程度有较高的关联。但是，案例研究中选择让步的时间范围（都发生在运动出现几年之前）与统计检验选择让步的时间范围不同，统计检验选择的是政治让步之后很快发生的非暴力行动。因此，长期来看，政治让步会带来较高的非暴力纪律水平，因为这会加强非暴力抵抗取得了成功的总体感觉；但是从短期来看，让步会降低非暴力纪律，因为统计检验显示，让步会使运动过于自负。

### 运动领袖呼吁非暴力纪律

这三个案例研究显示，强烈而且始终如一的呼吁，会带来更好的非暴力纪律。在格鲁吉亚，运动领袖始终发出要完全保持非暴力纪律的信息。在塞尔维亚，信息不是十分一致。运动中有一部分人——比如“欧特珀”——坚持非暴力抵抗战略。当他们主宰运动的时候，非暴力纪律非常好。但是“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联盟则准备对保安部队的镇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的战略是，主要使用非暴力战术，但是只要政府使用暴力镇压，他们就用暴力回击。

### 运动领导层强大、有凝聚力

这三场运动都很快形成了一个紧密而强有力的运动领导层。事实上，吉尔吉斯斯坦的运动领导层是三个案例中最强的，因为反对派采用了传统的管理和组织方式。高度的层级制组

织结构伴随着暴力，这一事实支持了统计检验的结果：非层级制的运动非暴力纪律往往更好。但是，由于这三场运动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层级制，所以层级制的影响很难判断。

### 运动战略目标稳健

温和的运动目标有利于非暴力纪律，这一预期影响因素也得到了有限的支持。在这三个案例中，运动都制定了革命性的目标。不过，在吉尔吉斯斯坦，运动早期的目标仅限于要求地方选举重新计票，这一阶段运动采取的行动也更加和平。当运动的目标转向推翻阿卡耶夫政权之后，暴力水平也提高了。但是，暴力水平的提高与运动目标的提高是否有直接关系，数据不是十分明显。

### 运动做出避免对抗的战术选择

做出避免对抗还是鼓励对抗的战术选择，也是能否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关键因素。破坏非暴力纪律与“守卫领土”的战略关系特别密切。

“守卫领土”这种对抗性战术在吉尔吉斯斯坦运动的早期十分突出。当时，奥什和贾拉拉巴德的抗议者暴力占领了地方政府大楼。守住这些实体地点成为运动的战略核心，最终招致了暴力镇压。反对派为了“收复”失地只能以暴制暴。在塞尔维亚也是如此，暴力主要发生在抗议者企图占领议会、国家电视台和其他实体地点的时候。

---

**破坏非暴力纪律与“守卫领土”  
的战略关系特别密切。**

---

而在格鲁吉亚，维持对实体地点的占领从来不是运动的战略核心。相反，当面临对抗升级的危险时，他们往往会撤离特定地点。唯一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对抗性占领实体地点的行动（萨卡什维利进入议会）也十分短暂，而且发生在政权的支持者已经四分五裂之后。



### 制定成员资格标准，把暴力分子排除在外

运动内部应对镇压的行为差异告诉我们，制定运动成员的资格标准十分重要。比如，在塞尔维亚，虽然暴力镇压持续了数年之久，但是早期面临镇压的是少数训练有素的学生活动家，因此，没有出现过破坏非暴力纪律的行为。当运动从核心的活动家扩大到有数十万抗议者参加之后，镇压导致暴力的动态关系才显示出来。

这表示，把暴力分子排除在运动之外与保持非暴力纪律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参加者基础较小，较有选择性的运动在面临镇压的时候，更有可能保持非暴力纪律，但是当运动规模扩大后，再面临镇压的时候，就更难保持非暴力纪律。

因此，重要的挑战是，怎样把非暴力纪律从坚定的核心团体扩大到更广泛的群体中去。运动的领袖必须在以下两点之间做出平衡：扩大运动规模获得的战略利益与参加者群体扩大可能导致的破坏非暴力纪律。

这一问题通常与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具体阶段有关。早期运动由少数坚定的活动家主导，保持非暴力纪律一般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当运动达到高潮，参加者的规模也比以前大得多的时候，保持非暴力纪律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关键在于，哪些运动在达到高潮的时候还能保持非暴力纪律。虽然从案例研究中获得的证据无法得出结论，但是从直觉上推测，运动发展的速度和发起战役的时机可能会产生影响。如果运动从早期阶段达到高潮的速度非常快，从坚定的核心团体过渡到大规模民众参与的过程非常短，就容易造成非暴力纪律遭到破坏。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可能会是今后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在比较这三个案例的时候，笔者提到了“武装派别”在运动中的作用。在塞尔维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案例中，“武装派别”与非暴力抵抗运动有关。在吉尔吉斯斯坦，“武装派别”与赤手空拳的抗议者混在一起，在若干场合与保安部队发生了暴力冲突。在塞尔维亚运动的后期，“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联盟部署了用来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的武装纠察队。

虽然笔者不能确定，然而可以推测的是，在塞尔维亚运动发展的最后阶段，武装纠察队可能在权力真空时期帮助维持了非暴力纪律。但是，这些团体的存在也证明，如果遭到暴力

镇压，“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联盟也可能会使用暴力，这也是运动的高潮阶段，非暴力纪律可能遭到破坏的因素之一。

### 运动参加者高度多样性

在这三个案例中，运动参加者的多样性似乎没有对非暴力纪律造成什么影响。在运动早期，参加者的多样性往往比较低（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但是，有证据显示，这三场运动在达到高潮的时候，参加者在各个维度上（年龄、性别、区域、政党）都存在高度的多样性。在格鲁吉亚，高度多样性的团体也保持了高度的非暴力纪律，但是在吉尔吉斯斯坦，运动却出现了大量的暴力行为。有关参加者多样性是否会对非暴力纪律造成影响，还需要对更多的资料进行研究，目前的案例研究尚无法做出判断。

### 运动对暴力行动的处罚

运动的处罚确实对非暴力纪律有所影响。对塞尔维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两个案例的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塞尔维亚，虽然反对派领袖曾经鼓励人们准备以某种程度的暴力来对付政府的镇压，但是当暴力对抗发生的时候，反对派和“欧特珀”的领袖也进行了干涉，并且谴责了那些“太过火”的抗议者。虽然处罚的程度相当轻微，但至少在抗议者的行动超出运动所能接受的暴力程度时，这些行为有可能受到某种处罚。而在吉尔吉斯斯坦，运动领袖不仅放任暴力，而且积极鼓励一定程度的暴力。

### 政府对非暴力行动的镇压

镇压的作用很明显，政府的镇压模式与破坏非暴力纪律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在格鲁吉亚，暴力镇压通常只针对运动领袖。在塞尔维亚，保安部队保持了克制，没有对抗议者使用极端暴力，但使用过催泪瓦斯和警棍袭击抗议者，激起了一定程度的暴力冲突。在吉尔吉斯斯坦，双方都卷入了激烈的暴力冲突。

在塞尔维亚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两个运动中，破坏非暴力纪律的行为确实更加普遍。在塞尔维亚，几乎所有破坏非暴力纪律的行为都发生在运动的最后一天，数十万抗议者涌向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时候。在吉尔吉斯斯坦，运动早期发生的暴力行为非常少，到运动中期暴力事件才多起来，在运动后期，首都比什凯克的政府所在地“白宫”外面发生的暴力冲突达到顶峰。

格鲁吉亚是非暴力纪律水平最高的国家，他们的运动也是三场运动中持续时间最短的，运动的主要活动持续了大约3周，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就辞职了。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抗议持续了几个月，塞尔维亚的运动则持续了数年之久。

运动的持续时间与破坏非暴力纪律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比如塞尔维亚的运动要比吉尔吉斯斯坦的运动长许多，但是非暴力纪律水平也高许多。不过，这三场运动的整体模式确实显示出，随着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持续，破坏非暴力纪律的事件会发生得越来越频繁。

表6总结了比较案例研究的结果，并且将这一结果与统计检验的结果进行了对比。这两项研究之间存在某些分歧，比如在政治让步的作用上。在案例研究中，让步一般与较高的非暴力纪律水平相关，在统计检验中，让步一般与较低的非暴力纪律水平相关。但是，正如前面所阐述过的，这可能涉及时间范畴的问题，统计检验的是政治让步后较短的时间范畴，而案例研究的是政治让步后较长的时间范畴。在案例研究中，革命性目标的影响也略有不同，“玫瑰革命”尽管具有革命性，但其非暴力纪律水平非常高。这说明，虽然统计检验的结果显示，革命性目标会使保持非暴力纪律更加困难，但是如果存在其他因素，比如运动领袖始终呼吁保持严格的非暴力纪律，那么保持非暴力纪律仍然是可能的。总之，比较案例研究的发现，补充并且深化了统计分析中的发现，同时，案例研究的发现与第一章论述的非暴力纪律的预期影响因素也是一致的。

表6. 案例研究对比与统计检验结果

影响因素	格鲁吉亚	塞尔维亚	吉尔吉斯斯坦	统计检验结果
历史经验	提高非暴力纪律	提高非暴力纪律	无明显影响	微弱提高
信息/培训	提高非暴力纪律	提高非暴力纪律	未能提高非暴力纪律	无数据
过去的非暴力抵抗战术	无数据	微弱提高	无数据	无影响
有利的外部环境	提高非暴力纪律	提高非暴力纪律	无数据	无数据
呼吁非暴力纪律	提高非暴力纪律	微弱提高	没有发生过	无数据
层级制	提高非暴力纪律	效果不一	降低非暴力纪律	降低非暴力纪律
目标稳健	革命性目标，但非暴力纪律水平很高	不明	提高非暴力纪律	提高非暴力纪律
使用避免对抗性战术	提高非暴力纪律	提高非暴力纪律	无数据	微弱提高
成员资格标准	无数据	实施了成员资格标准后提高了非暴力纪律	没有出现过	无数据
参加者多样性	无明显影响	无明显影响	无明显影响	无影响
运动处罚	无数据	微弱提高	无处罚	无数据
镇压	无数据	降低非暴力纪律	降低非暴力纪律	降低非暴力纪律
运动持续时间	无数据	降低非暴力纪律	降低非暴力纪律	微弱降低

## 结论：把非暴力纪律的知识应用于实践

---

本书提出了一个通用的非暴力纪律理论，该理论根据过去文献中对非暴力抵抗问题的论述和简单的数学模型制作了一个能够保持非暴力纪律的预期影响因素清单。用NAVCO 3.0数据库中的数据和三个比较案例研究，检验了这些预期影响因素的作用。在最后一章总结了检验的主要发现，并且给学者、活动家和外国的公民社会与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某些实用的建议。

### 与学者有关的研究成果

本书希望能够在影响运动中的非暴力纪律的各种因素这一领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笔者在非暴力纪律这一研究领域首次使用统计检验和案例研究方法，因此，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为什么只有在运动的领袖始终、明确地发出保持非暴力纪律的信息时，运动内部的团结才能够对非暴力纪律产生正面影响，而不是运动内部的团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对非暴力纪律产生正面影响。

非暴力纪律最初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也仍然没有答案。本书的理论假设，是运动的领袖呼吁其追随者保持非暴力纪律。然而，运动领袖为什么会做出这一选择，这也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sup>34</sup> 这些研究可以从本书的研究成果（比如运动领导层对保持非暴力纪律态度的重要性）中获益。研究一个运动是否能坚持非暴力纪律，也能够对这个运动是否能坚持自己的战略有所借鉴。

在非层级制的运动中，非暴力纪律水平较高，这一发现可能会启发一些新的研究。温迪·皮尔曼（2011）提出，要保持非暴力纪律，必须有一个集中统一的运动组织结构。温迪·皮尔曼的观点在这一领域非常有影响。

---

**在非层级制的运动中，非暴力纪律水平较高，这一发现可能会启发一些新的研究。**

---

---

<sup>34</sup> 见阿萨尔等人，2013；巴克，2010；坎宁安，2013；劳伦斯，2010；皮尔曼，2011。



怎样把她的研究成果与本书的发现协调起来？为什么在非层级制的运动中，非暴力纪律水平较高，虽然本书对此提供了某些理论推测，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找到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本书最惊人的发现，是政治让步与破坏非暴力纪律的行为增加有关，这个问题亟待更多的研究。为什么在所有的案例中政治让步后的短期内，破坏非暴力纪律的行为会上升，虽然本书也提供了某些观点，而且得到了凯瑟琳·坎宁安（2013、2014）等学者的补充，但这些观点只是推测性的。对于政治让步后短期内运动发生的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这一问题。

暴力和非暴力斗争的历史经验很重要，但统计检验和案例研究显示，其作用并不一致。虽然过去的经验确实会被统治者和运动领袖所考虑，但其影响十分复杂。案例显示，历史经验中有一个十分特别的方面，即过去的暴力冲突发生的区域和严厉程度会对非暴力纪律产生影响，这一点也值得学者们做进一步的研究。过去的暴力和非暴力斗争的特征，对将来的暴力和非暴力行动的模式有何影响，也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本理论主要建立在个人层面上，这表明，未来从个人层面上开始有关非暴力纪律的研究可能会结出硕果。第一步或者就是给数学模型中包含的各个因素——比如个人对非暴力和暴力行动的偏好（ $b_{nv}$ 和 $b_v$ 因素）——赋值（给一个计算的数值）。对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参加者进行调查或者深度访谈，通常是获得数据的好办法。收集这种个人层面的数据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切入点，让我们观察到各种预期影响因素是怎样对运动中每位参加者的个人偏好产生直接影响的。

对于培训在有效的非暴力抵抗中起到的作用进行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非暴力纪律是怎样维持的。案例研究的证据显示，培训的深度和质量通常会影响培训的作用。但此处给出的证据只是一个提示，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培训的哪些方面对于促进非暴力纪律特别重要？比如，是给运动的领袖提供非暴力抵抗的一般原理的培训更加重要，还是给运动的参加者提供使用非暴力手段应对镇压的实践经验更加重要？一场简短的演讲式的培训课程能够对非暴力抵抗运动产生影响吗？或者一个长期、密集的培训计划才能够对非暴力抵抗运动产生影响？有好几个组织——比如，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CANVAS）、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和“起来”（Rhize）——都在从事各种形式

的非暴力抵抗培训。更好地理解不同的培训模式会对非暴力纪律产生哪些影响，可以为他们的工作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持。

虽然本书研究了大量一般性的影响因素，但绝不是完满无缺的。笔者没有涉及到的其他许多因素，也可能对非暴力纪律产生稳定的影响。

还有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径是性别对非暴力纪律的影响。<sup>35</sup> 女性对运动的贡献常常被忽视，事实上，她们的参与对于许多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成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麦卡利斯特，1988）。从有个人魅力的运动领袖，比如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和也门的塔瓦库·卡曼，到勇敢的运动先锋，比如美国的罗莎·帕克斯和阿根廷的“五月广场母亲”，非暴力抵抗的故事常常就是女性的故事。正如乔杜尔和金所观察到的，在许多运动中，“女性常常是最遵守非暴力纪律的”（乔杜尔和金，2014，433）。毫无疑问，性别规范的复杂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所不同，但是在许多情形中，女性通常不容易受到男性用暴力对待不公的“尚武文化”的影响（巴特科沃斯基，2013），她们更容易保持非暴力纪律。研究性别对非暴力纪律的具体影响，以及促进性别多样性给非暴力抵抗带来的战略优势，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的数学模型中没有包括的另一个潜在影响因素，是其他运动参加者行为的影响。<sup>36</sup> 虽然本书研究了运动领袖行为的影响，但是活动家个人也可能对运动中其他活动家的选择产生强大的影响。如果你周围的每个人都遵守非暴力纪律，那你也这样做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因此，虽然每个人选择遵守非暴力纪律的原因不同，但是遵守和破坏非暴力纪律的模式，有可能会是运动参加者个人模仿同伴的行为。与非层级制的运动非暴力纪律更好的观点联系起来看，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非层级结构通常更容易发挥同伴的作用。

---

<sup>35</sup> 感谢一位匿名评审员提出这一视角。

<sup>36</sup> 感谢布赖恩·马丁提出这种潜在的影响因素。

## 与活动家有关的研究成果

对于从事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组织者来说，本书关于镇压会破坏非暴力纪律的结论与他们的认知相同。在非暴力行动遭遇暴力镇压的情况下，破坏非暴力纪律的事件最容易发生，也最引人注目。因此，一些非暴力运动的批评者认为，非暴力行动根本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最终运动取得成功是因为运动的组织者选择了暴力战术。然而，并不是非暴力抵抗未能取得成功

**镇压会使在非暴力抵抗动员过程中保持非暴力纪律成为一项长期的挑战，导致人们在抵抗过程中更容易破坏非暴力纪律。**

导致运动的组织者选择了暴力战术，而是镇压会使在非暴力抵抗动员过程中保持非暴力纪律成为一项长期的挑战，导致人们在抵抗过程中更容易破坏非暴力纪律。

另一方面，统计检验结果与人们通常认为镇压会破坏非暴力纪律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破坏非暴力纪律的行为往往并不是在镇压之后马上发生的，而是在过去多起非暴力行动持续遭到镇压之后才会发生。也就是说，一系列镇压行动之后出现的破坏非暴力纪律的行为不是人们立即进行的“反击”，而是针对正在变得更加暴力的政治环境产生的一种长期的应对方式。我乐观的推论，这一结论可能暗示着，在镇压发生之后，在破坏非暴力纪律发生之前，活动家有数周或者数月的时间可以调整自己的战略。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运动怎样才能避免激活这一“镇压-破坏非暴力纪律/被暴力控制”的格局。统计检验结果显示，在这个问题上，层级制的运动和表面上团结一致的运动很可能会适得其反。而那些允许在目标或者意识形态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的非层级制的运动，更有助于维持高水平的非暴力纪律。这表明，那些参加者个人认同自己是运动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服从领袖命令的运动，通常更能激励参加者保持非暴力纪律。组织者和活动家如果希望激励追随者保持非暴力，明智的做法就是建设一个包容性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要让人们能够产生主人翁意识，允许人们讨论彼此的分歧并且解决分歧，而不是压制分歧。

从案例研究中获得的证据，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如何保持非暴力纪律的问题。在这三个案例中，如果运动领导层明确而且始终如一地强调非暴力战略，那么集中制和层级制的

领导方式有助于保持非暴力纪律。如果像在吉尔吉斯斯坦那样，领导层高度集中，但是并不完全支持非暴力抵抗，那么运动就更容易破坏非暴力纪律。

政治让步与破坏非暴力纪律的行为增加有相关性，这一惊人的发现向非暴力行动的践行者发出了警告。虽然这一发现的具体意义尚不明确，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但是这一发现的统计检验结果一致性很强。表明这一现象是许多不同的运动都存在的真实、一贯的模式。因此，活动家应该注意这一发现，并且为此做好准备。赢得了政治让步的运动不要“居功自傲”，以至于失去工作的重点。应该继续尽一切力量让运动保持势头、团结和非暴力纪律。活动家还应该注意，不要因为政治让步使温和派离开运动，或者给运动带来分裂，因为这可能会让更加激进和暴力的团体放手实施暴力战术（坎宁安，2014）。为政治让步可能会带来的这一负面影响制定战略，做好准备，对希望保持非暴力纪律的运动至关重要。

在具体的战术问题上，微弱的统计数据显示，与抗议或者静坐相比，罢工和抵制更容易保持非暴力纪律。虽然这一统计数据相当微弱，但是把它与案例研究联系在一起，这一证据就明确多了。选择避免直接身体对抗的战术，并不只是在“罢工与静坐”之间做出选择那么简单。促进非暴力纪律并没有万全之策。战术选择非常依赖于政治环境。就像在格鲁吉亚那样，如果人们确信不会遭到暴力镇压，那么身体对抗战术就是比较合适的战术，如果人们确信会遭到镇压，那么明智的做法或许就是取消对抗战术，选择不合作战术或者分散战术。

### 与外国公民社会和政策制定者有关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研究成果能为外部支持者（公民社会和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为非暴力抵抗运动提供援助的人——提供什么呢？

第一，非暴力抵抗培训必须经过精心规划和思考。仅仅促进信息传播，可能不足以传达某些关键信息，比如非暴力纪律的重要性。对传播非暴力抵抗知识有兴趣的外部支持者，应该致力于更加具体全面的培训。

第二，对不尊重人民的自由结社权的政府施加压力十分重要（施加压力的方法包括揭露，使用或者威胁使用制裁手段），尤其是在政府使用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抗议者的时候。外部压力即使只能够略微降低镇压的频率和力度，也能对运动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外交官和国际人权活动家即使不能完全阻止一个政府镇压和平的非暴力抵抗，也不应放弃努力。即使这种努力对镇压带来的影响很少，也能使活动家保持非暴力纪律的行为明显增加，使国内政治更加和平，更加具有改革能力。

第三，如果外部支持者能够为非暴力抵抗运动提供帮助，就应该尽早进行。至少不应等到运动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再继续进行。运动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破坏非暴力纪律。

---

**如果外部支持者能够为非暴力抵抗运动提供帮助，就应该尽早进行。**

---

第四，外部支持者在评估应该支持哪些运动的时候，不应急于放弃那些缺乏层级结构或者存在重大内部分歧的运动。虽然对外部支持者来说，与一个没有统一领导的非层级结构的运动互动可能更加困难，但是这些运动或许更能保持非暴力纪律，长期来看，这样的运动会更有效。

对于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许多问题仍然模糊不清。然而，在一个威权主义仍然存在或者随时可能复活的时代（巴罗斯和斯蒂芬），了解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潜在和挑战，以及非暴力纪律的原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笔者希望，本书能够为建设一个促进自由和正义的知识体系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 统计附录

本统计附录提供了统计检验部分使用的操作变量与统计检验方法的细节和理由，还对各种稳健性检验（用以确保统计检验的发现是真实的）做出了技术性更强的说明。本附录应该能够引起那些有数量思维，关注检验过程细节的学者的兴趣，还能引起那些关心统计检验结构或者对此有疑问的人们的兴趣。

统计检验的数据来自非暴力与暴力运动及其结果（NAVCO）3.0数据库——这是尚未完成的NAVCO数据收集项目的最新版本。<sup>37</sup> NAVCO 3.0数据库收集了全球若干国家从1991-2012年间的各种政治斗争的信息。相比之前的NAVCO数据库版本，NAVCO 3.0的数据高度离散，每个事件单独编码，而不是按运动或者运动年来编码。

统计检验的单位是每一次具体事件。衡量非暴力纪律的方法，是看一个非暴力运动中的某一个具体事件是否涉及暴力行动，事件的属性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因此，因变量不是某一个运动的“非暴力纪律”平均分，而是某一特定事件中出现暴力的可能性。

基本的数据编码是根据CAMEO编码方式<sup>38</sup>的结构，按照“行动者”、“行动”、“对象”进行分类的。在NAVCO数据库中，每个分类又再分成三个小类。下面的附录表1举例说明了一个典型的NAVCO 3.0核心代码行。这个具体的代码行代表抗议学生（ACT STU）为了政策变革而参加了抗议示威，抗议的对象是教育部（GOV EDU）。

---

<sup>37</sup> 有关这一项目的更多信息，见 [www.navcodata.org](http://www.navcodata.org)，以及埃里卡·切诺韦思和奥里恩·刘易斯《剖析非暴力运动：NAVCO 2.0 数据库简介》，《和平研究杂志》，50.3（2013）。

<sup>38</sup> 菲利普·施罗特《CAMEO：冲突与调解事件观察：事件与行动者编码本》，《计算事件数据系统》（2012）。

附录表1. 案例研究对比与统计检验结果

行动者 _3	行动者 _6	行动者 _9	动作 _10	动作 _100	动作 _1000	对象 _3	对象 _6	对象 _9
ACT	STU		14	141	1412	GOV	ED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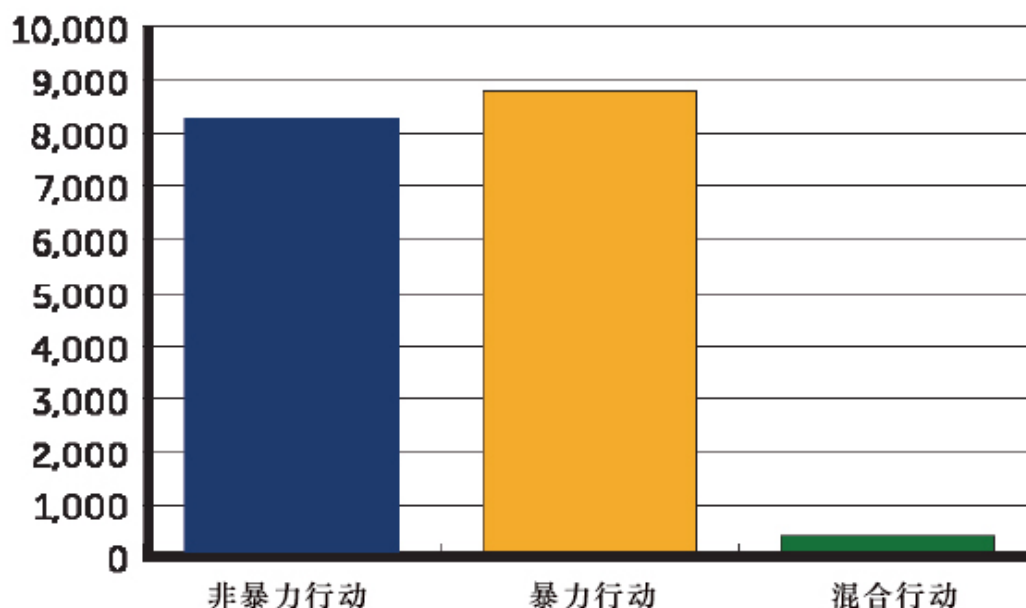
除了核心的行动者-行动-对象的数据之外，NAVCO 3.0还包含了大量其他的变量编码元素，比如具体地点、参加者人数和政府的镇压程度。辅助变量的完整清单见NAVCO 3.0编码本。

所有事件被拆分为行动者、行动和对象三类。比如，同样的行动者所采取的不同战术被分为不同的数据行。事件也按日拆分。比如，一场持续10天的罢工被编码为10个单独的“事件日”，每天都有自己的编码信息。这种拆分方式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可能对“事件”的定义产生的分歧——在把不同的行动聚合成一个“事件”的时候，可能存在对定义不同的意见。

本研究从NAVCO 3.0数据库中选择了14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采取的全部线下行动。<sup>39</sup> 样本限制在线下行动，排除了不涉及非暴力纪律的情况。样本中包含的国家代表了过去25年发生的有一定代表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包括“阿拉伯之春”中所有的政权更迭案例（埃及、突尼斯和也门）。样本总量有17,892个事件，暴力事件和非暴力事件大致相等，既包含暴力因素又包含非暴力因素的“混合”事件相对较少（见附录图1）。

<sup>39</sup> 用专业术语来说，样本中排除了所有一级动作编码为13或13以下的事件（非线下行动）。

附录图1. 事件总数



在这一样本中，每个行动都属于某个特定的暴力或者非暴力运动。归类过程分两步进行：第一步，考察NAVCO 3.0数据库中包含的行动目标和行动者名字的数据；第二步，如果有必要，还要通过考察数据来源辨别数据的可靠性。归类过程使用的运动定义，采用了切诺韦思和斯蒂芬对运动的定义（切诺韦思和斯蒂芬，2011，6），但是放宽了某些要求，以便将更多的事件包含进去。一组事件要被归类为某场运动，之间必须存在有意义的联系，一组事件至少要包含在三个不同的事件，间隔时间不能超过一年。

经过这一过程，很容易把大多数事件归属到某一场运动。归属关系不明的事件则被编码为“未知”，并从与运动定性有关的统计检验中删除。

然后，运动被划分为若干个运动类型，包括运动是否有革命性目标，<sup>40</sup> 运动是否以暴力为主，运动是否包含在NAVCO 2.0数据库中。下一步，删除掉所有以暴力为主的运动中的事件，删除掉不属于任何一场运动的事件，只检验具有革命性目标的运动和NAVCO 2.0数据库中的运动。大多数检验——包括本书正文中提到的所有检验——结果都删除了发生在民

<sup>40</sup> 指谋求政权更迭、领土分离或者结束占领的运动。见切诺韦思和斯蒂芬《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

主国家的事件。某一特定事件是否发生在民主国家，是使用《政体4数据库》<sup>41</sup>中的政体2变量来确定的。任何政体2分数高于5的国家当年发生的运动，都被认为是发生在民主国家。

衡量非暴力纪律的重要因变量，依据的是NAVCO 3.0数据库中的战术\_选择变量，该变量把事件分为“非暴力”、“暴力”或“混合”，并被转换为一个二元变量（非暴力纪律），如果事件维持了非暴力纪律，数值为1，如果事件破坏了非暴力纪律，或者是“混合”的，数值为0。

笔者使用了NAVCO 2.0、NAVCO 3.0和其他数据库中的各种变量作为自变量。有关暴力和非暴力抵抗历史经验的数据，来自NAVCO 2.0数据库和不断补充的NAVCO 2.0数据库附件（目前正在编码）。四个二元变量（非暴力-过去成功，非暴力-过去失败，暴力-过去成功，暴力-过去失败）描述了一个国家过去在这两类运动方面的成败。虽然本研究没有限制时间，但是NAVCO 2.0数据库收集的运动最早发生在1945年。

衡量非暴力抵抗战术的范围（斗争剧目），使用的是NAVCO 3.0数据库。衡量非暴力抵抗战术范围的主要方法，是把某一年中所有的非暴力行动相加，然后把这一数字乘以非暴力行动的种类（依据CAMEO编码方式），再计算这一数字5年中的平均数，并且将其标准化为0-1之间的一个数。<sup>42</sup>这是用NAVCO 3.0数据库里的数据把非暴力抵抗战术的范围标准化的最佳方法，理由如下：第一，事件的数字（非暴力抵抗的频率）乘以斗争的类型（战术多样性）这一方法，说明了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第二，计算事件的数字（非暴力抵抗的频率）乘以斗争的类型这一数字5年的平均数的方法，说明了非暴力抵抗战术的范围会慢慢改变的事实。计算更长时间的平均数或许也是可行的，不过，由于NAVCO 3.0数据库的时间跨度相对较短，因此其可行性受到了限制。

衡量外部政治环境（H4）和镇压（H12），使用的是NAVCO 3.0数据库中的国家\_态度变量，该变量描述了国家对特定事件的反应，从完全让步到通过有目的的屠杀实施暴力镇

---

<sup>41</sup> 蒙蒂·马歇尔《政体4年度时间序列 1800-2014》数据库，(2015)。

<sup>42</sup> 对衡量非暴力抵抗战术范围的稳健性检验还使用了3年的平均数，另外还使用了只计算5年中非暴力行动总和的平均数，不用事件的数字（非暴力抵抗的频率）乘以斗争的类型。这些不同的操作化方法结果是一致的。

压。笔者用国家\_态度变量创造了镇压和让步两个二元变量。然后计算最近25次暴力和非暴力事件中这两个变量的平均值，以此来检验近期发生的暴力和非暴力事件中有多少遭到了镇压，有多少获得了某种形式的政治让步。<sup>43</sup>

衡量稳健的战略目标，使用的是笔者自己编码的“革命性”目标变量来衡量的，NAVCO 3.0数据库中的运动\_目标变量给笔者提供了信息。笔者自己编码，而不仅仅是综合NAVCO 3.0数据库原有的编码，主要是因为数据缺失，而且这样做也能更好地描述事件之间的关联。

衡量对抗/非对抗性战术选择，使用的是NAVCO 3.0数据库中的非暴力\_种类变量，该变量按照吉恩·夏普的方法把事件分为三类：“抗议与说服”、“不合作”和“干涉”。<sup>44</sup> 本书按照吉恩·夏普的观点，将不合作作为对抗性最低的战术，将干涉作为对抗性最高的战术。

衡量领导层的凝聚力和运动的多样性，使用的是NAVCO 2.0数据库中的变量，因此，包含这些变量的模型仅限于NAVCO 2.0数据库中已经编码的运动。衡量领导层的凝聚力，使用的是NAVCO 2.00数据库中的运动\_内部分歧\_力度和运动\_结构变量，前者描述了运动的内部分歧程度（从“团结”到“不同团体之间暴力竞争”），后者描述了运动是否有一个集中制的层级结构。衡量运动多样性，综合了NAVCO 2.0数据库中的9个多样性维度，<sup>45</sup> 建立一个多样性指数，分数从0到9不等。

衡量运动持续的时间，是计算运动有记录以来的第一天直到最后一天，一共有多少天。计算天数时要在Excel上用事件最后一天的日期减去事件第一天的日期。由于这一变量的范围相当大（主要检验样本中能观察到的最大值是7456），为了使这一变量与模型中其他的变量相匹配，本书大多数检验方法都把这一变量按比例缩小了。检验一开始是用从0到1按比例缩小版本来做的（比如用天数除以7456）。为了避免超高的异常值可能带来的偏差，笔者将超过3442.25的数据排除，剩余的数据每一个都除以3442.25，然后使用这个缩小版本进

<sup>43</sup> 笔者的主要检验使用了过去25次非暴力和暴力事件的平均值。稳健性检验使用了较短或较长时间的平均值（过去10起或30起事件），结果也是一致的。

<sup>44</sup> 吉恩·夏普《非暴力行动的政治》。

<sup>45</sup> 性别、年龄、阶级、农村-城市、意识形态、政党、地区、种族、宗教。



行检验。3442.25是运持续时间的平均数加上3个标准差。使用这两种方法缩小后的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

衡量成员资格标准，是检验青年学生实施的行动是否比其他人实施的行动更有可能破坏非暴力纪律。虽然这一检验结果没有直接回答成员资格标准的问题，但它证明了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年轻人参加运动不会破坏非暴力纪律。这一检验也使用了NAVCO 3.0数据库中的行动者编码，STU编码代表由学生实施的行动，YTH编码代表由青年人实施的行动。

本文主要检验样本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统计数字汇总，见附录表2。<sup>46</sup>

附录表2. 统计数字汇总

变量	观测数据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非暴力纪律	5987	0.860531	0.346464	0	1
过去的镇压（非暴力）	5684	0.134296	0.169879	0	1
过去的让步（非暴力）	5684	0.027573	0.060367	0	0.722222
过去的镇压（暴力）	5565	0.409666	0.259576	0	1
过去的让步（暴力）	5565	0.003153	0.013291	0	0.181818
过去的运动成功（非暴力）	4853	0.301463	0.458941	0	1
过去的运动失败（非暴力）	4853	0.512261	0.499901	0	1
过去的运动成功（暴力）	4853	0.534721	0.498844	0	1
过去的运动失败（暴力）	4853	48.43215	131.6934	0	1

<sup>46</sup> 所有事件都来自非民主国家，而且排除了以暴力为主的运动中的事件和不属于任何运动的事件。

运动层级制	1208	0.024007	0.153133	0	1
运动内部分歧	1269	0.651694	0.514804	0	2
运动多样性	1269	6.339638	2.828234	2	9
事件参与情况（据记载）	2713	2.862363	1.280963	0	6.30103
非暴力抵抗战术的范围得分	5666	0.098575	0.113608	0	0.446442
具有革命性目标的运动	5699	0.471837	0.49925	0	1
抗议	5699	0.30286	0.459536	0	1
干涉	5699	0.143183	0.35029	0	1
不合作	5699	0.43376	0.495636	0	1
学生	5699	0.0876	0.2827	0	1
运动时间	5987	476.9733	988.4628	0	7456

本文使用的主要统计工具是多级逻辑回归。<sup>47</sup> 在检验多个国家/运动的事件数据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从同一个国家或者同一场运动中获得的各種样本之间不是互相独立的。因此，从简单的线性回归或者逻辑回归工具中所得到的统计结果有可能是错误的。研究冲突问题的学者一般会使用稳健标准误<sup>48</sup> 来避免这一问题。但是，虽然稳健标准误方法或许有助于避免统计推断中出现某些问题，但是描述多级数据结构更好的方法，是使用多级逻辑回归。多级逻辑回归能够明确地把那些与背景有关的事实纳入到检验之中，而且能够提高

<sup>47</sup> 见马可·斯滕贝亨和布拉德福德·琼斯《多级数据结构建模》，《美国政治科学杂志》，46.1（2002）。

<sup>48</sup> 见埃里卡·切诺韦思和玛丽亚·斯蒂芬《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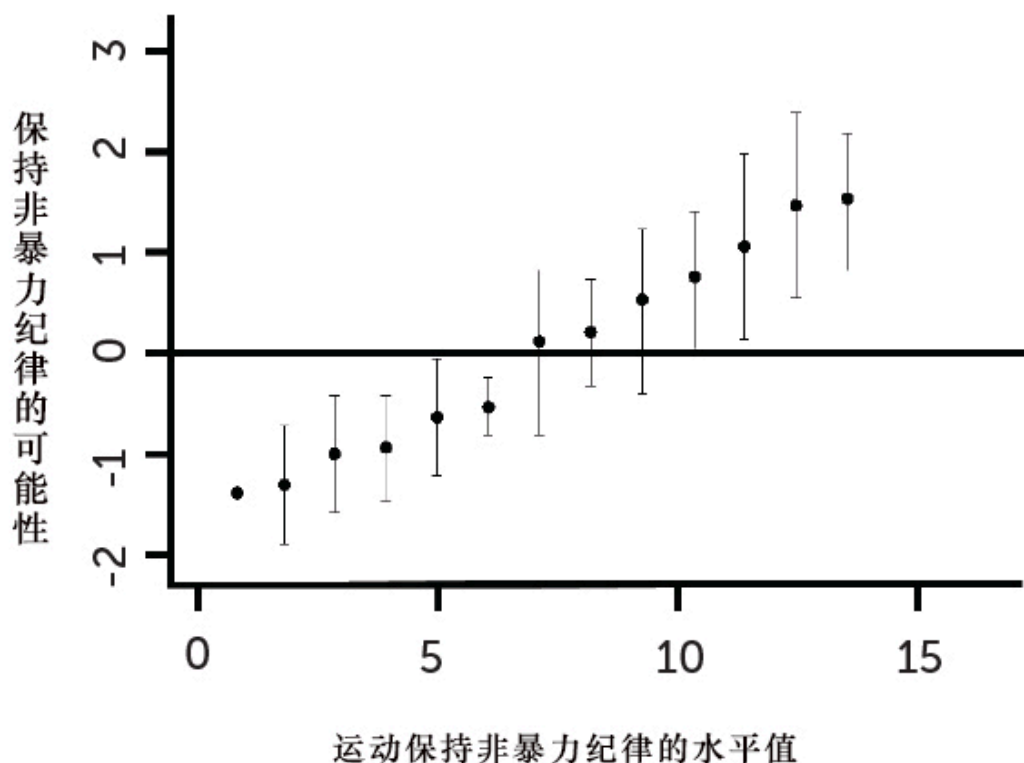
统计模型的拟合和预测能力。多级逻辑回归是政治行为研究的标准方法，但直到最近才开始被研究和平与冲突问题的学者所使用。

对于本文出现的几个特别重要的变量，笔者已经在正文中陈述了它们的边际效应和预测概率。这些数据是使用适合特定的自变量的最广泛的模型推算出来的。比如，为了衡量整个检验样本中出现的变量的边际效应，模型使用了最完整的样本变量。为了衡量只出现在 NAVCO 2.1 数据库运动样本中的变量的边际效应（如层级制、内部分歧和多样性），整个模型使用了除了战术选择变量（理由将在下面讨论）之外的所有变量。笔者研究自变量在不同值上的预测概率时，二元变量设置为0，连续变量设置为平均数。

## 结果与讨论

笔者的统计检验的第一个重要结果：数据明确显示，要把背景纳入统计检验中。正如附录图2所示，在 NAVCO 数据库中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方差明显偏离零，所以背景不同的运动非暴力纪律的平均水平会有很大差异。

这一结果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它强调了使用适当的统计方法来检验不同运动的背景差异是至关重要的。

附录图2 .在NAVCO数据库中运动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基础率<sup>49</sup>

笔者总结了数学模型中的主要变量。正如附录表3所示，许多变量与之前的预期影响因素明显一致。在各种变量之中，过去政府对非暴力行动的镇压水平能够最真实、最显著地削弱非暴力纪律。

<sup>49</sup> 附录图2中的纵轴代表了在NAVCO数据库中每场运动的具体事件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可能性（不考虑模型中的自变量），用对数概率来衡量。横轴代表了不同的运动保持非暴力纪律的水平值，从最差到最完美。图中的圆点代表运动，从圆点上延伸出来的竖线代表95%的置信区间。置信区间和零线之间没有交叉的运动，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对数概率与零之间差异显著。

附录表3. 回归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过去的镇压 (非暴力)	-2.556***	-2.447***	-2.656***	-2.473***	-2.649***	-1.574***	-0.645***
过去的让步 (非暴力)		-5.110***	-5.062***	-5.136***	-5.017***	-9.253***	-21.642***
过去的镇压 (暴力)		-0.263	-0.321	-0.200	-0.106	0.730	0.693
过去的让步 (暴力)		0.327	0.301	0.011	0.898	5.063	8.712
过去的运动成 功 (非暴力)			-0.114	-0.166	-0.0846	2.339***	2.569*
过去的运动失 败 (非暴力)			-1.060***	-1.139***	-0.853**	0.314	-0.165
过去的运动成 功 (暴力)			-0.078	-0.151	-0.232	0.583	1.680
过去的运动失 败 (暴力)			0.564	0.663	0.567	-1.221**	-3.091**
非暴力抵抗战 术的范围得分				0.218	0.258	-1.313	1.280



具有革命性目标的运动				-2.602***	-2.548***		
学生					-0.548***	-0.154	-0.381
运动时间（按比例缩小）					-1.025***	1.364	
层级制						-1.174*	1.756
内部分歧						1.634**	1.842**
抗议							4.432***
恒量	3.387***	3.644***	3.470***	4.181***	4.245***	0.428	-2.221
事件总数	5978	5855	4929	4755	4755	965	965
运动总数	230	227	198	195	195	10	10
卡方检验	64.09***	102.27***	125.18***	150.53***	157.02***	58.42***	236.55***

出乎意料的是，过去政府对非暴力行动的政治让步，也会显著降低非暴力纪律，而且这一关系在各种模型之间显著一致。<sup>50</sup> 这一发现显示，政府向非暴力抵抗运动让步之后，运动更有可能出现破坏非暴力纪律的事件，这与第一章中的预期影响因素背道而驰。这一发现在改变自变量的数值或者从样本中删除异常值（偏离平均值超过3个标准差的样本数据）之后，结果仍然显著。在政治让步的问题上，异常值数量很多，有160个样本数据高于平均值超过3个标准差。删除这些异常值只是略微降低了政治让步与非暴力纪律关系的显著性，对事件协同作用的大小没有实质性影响。

过去政府对非暴力行动的政治让步会显著降低非暴力纪律，这一关系产生的可能原因——尤其是让步会使运动“过于自负”——在正文中有详细的讨论。

过去政府对暴力行动的镇压和让步，不会显著影响非暴力纪律。不过，如果不区分政府对暴力行动和非暴力行动的镇压和让步，只单纯考虑镇压和让步，<sup>51</sup> 两者都会显著降低非暴力纪律。

历史上成功和失败的斗争经验对非暴力纪律的影响不一。所有过去的非暴力运动，在大样本中没有一个变量对非暴力纪律有显著影响。但是过去失败的暴力运动的变量对非暴力纪律有显著影响，但其协同作用非常之小，以至于实际作用近乎于零。

但是，如果把样本缩小到NAVCO 2.0数据库中发生的运动，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一样本中，所有四个变量都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成功的非暴力抵抗和失败的暴力抵抗的历史都加强了非暴力纪律，而失败的非暴力抵抗和成功的暴力抵抗的历史都削弱了非暴力纪律。

之前使用过的非暴力抵抗战术的范围（斗争剧目）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在大样本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显著降低了非暴力纪律，但是在NAVCO数据库的运动中没有显著影响。学生参与的运动对非暴力纪律的影响也类似，在大样本的所有运动中都降低了非暴力纪律，但是在NAVCO数据库的运动中没有显著影响。

<sup>50</sup> 事件协同作用的大小并不代表对非暴力纪律的影响显著，而是代表了事件之间互相影响显著。见附录表2统计数字汇总。

<sup>51</sup> 等于暴力镇压/让步的程度减去非暴力镇压/让步的程度。

所有的运动内部特征（层级制、内部分歧、多样性）对非暴力纪律的影响，样本都来自 NAVCO 数据库，因此，可检验的统计数据较小。多样性的变量对非暴力纪律的影响统计结果不显著，各个模型的p值都非常高。层级制和内部分歧的变量对非暴力纪律的影响统计结果显著，但是方向与预期相反，层级制会削弱非暴力纪律，而内部分歧会增加非暴力纪律。可能的原因在正文中已经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非层级制更加符合马蒂尼有关“运动属于我”和“我为运动做贡献”的论证，而不是皮尔曼有关运动分裂的论证。<sup>52</sup>

在本书主要的检验样本中，运动的持续时间符合对非暴力纪律的预期影响，从运动开始之日起，随着时间的持续，破坏非暴力纪律的可能性会增加。不过，如果把样本限制在 NAVCO 2.0 数据库中的运动，这一变量的显著性就不那么强了。这表示这一关系的稳健性不足。

战术对抗性对非暴力纪律的影响变量很复杂，虽然这一变量在统计模型中非常显著，但是对数据所做的进一步研究显示，这是由于数据结构造成的。在 NAVCO 3.0 数据库中，相比抗议、不合作和干涉之类通常描述非暴力行动的战术，其他一些战术——比如枪击和暴乱——显然是用来描绘暴力的。因此，这种统计结果是将非暴力行动和暴力行动做比较，而不是在非暴力行动中将不同的战术做比较。

为了真正的检验非暴力行动中的不同战术对非暴力纪律的影响，笔者从数据库中删除了暴力行动的数据（占破坏非暴力纪律数据的大多数），又进行了同样的检验，结果是非暴力抵抗的三种类型对非暴力纪律的影响不显著。虽然模式不够稳定，但是抗议与不合作战术确实会增强非暴力纪律，而干涉战术会削弱非暴力纪律。

附录表4简要总结了统计检验的结果是否支持预期影响因素。正文中详细讨论了有关结果的意义。

---

<sup>52</sup> 马蒂尼《战略性非暴力的力量》；皮尔曼《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

附录表4. 统计结果

	自变量	检验结果
H1	暴力和非暴力斗争的历史经验	支持
H2	与非暴力抵抗运动有关的信息	没有检验
H3	非暴力抵抗战术的范围	不支持
H4	镇压和让步	相反
H5	运动领导层呼吁非暴力纪律	没有检验
H6	运动领导层强大、有凝聚力	相反
H7	战略目标是否具有革命性	支持
H8	做出避免对抗的战术选择	没有结论
H9	制定成员资格标准，把暴力分子排除在外	没有结论
H10	成员多样性	不支持
H11	运动对暴力行动进行处罚	没有检验
H12	政府对暴力抵抗实施有差别的镇压	支持
H13	运动的持续时间	支持

## 引用文献

略



## 案例研究资料

略

## 图表清单

图1. 非暴力纪律光谱

表1. 数学模型中的元素

表2. 需要检验的预期影响因素

图2. 举例说明过去镇压的影响

图3. 行动遭到镇压的百分比

图4. 镇压对非暴力纪律的影响

图5. 运动的组织结构与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可能性

图6. 战略目标与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可能性

表3. 统计检验结果

表4. “颜色革命”简要对比

塞尔维亚地图

格鲁吉亚地图

吉尔吉斯斯坦地图

表5. 案例研究对比的主要结果

表6. 案例研究对比与统计检验结果

附录表1. 案例研究对比与统计检验结果

附录图1. 事件总数

附录表2. 统计数字汇总

附录图2. 在NAVCO数据库中运动保持非暴力纪律的基础率

附录表3. 回归模型

附录表4. 统计结果

## 如何理解本书 一

非暴力行动在什么时候会保持非暴力纪律？在什么时候会发生暴力行动？本书中，乔纳森·平克尼分析了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哪些因素会促进非暴力纪律，哪些因素会破坏非暴力纪律。乔纳森·平克尼的研究，结合了对数千起暴力和非暴力行动的定量检验，对“颜色革命”中三个有影响的非暴力抵抗案例的详尽对比，为一线的运动组织者、活动家和实践者（他们的工作会对非暴力斗争的结果产生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使我们了解到，为什么镇压会导致暴力还击，而政府的让步也并不会使暴力下降。另一方面，我们也了解到，用包容和非层级制的方式组织运动，有助于加强非暴力纪律。

欲获得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专著丛书中的其他出版物，请访问：[www.nonviolent-conflict.org](http://www.nonviolent-conflict.org)



乔纳森·平克尼是美国丹佛大学克贝尔学院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和谢寿康国际安全与外交中心研究员，同时还是非暴力与暴力运动及其结果（NAVCO）3.0数据库项目负责人。他的研究方向是非民主国家的体制外政治斗争。他的论文研究了非暴力抵抗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乔纳森·平克尼的作品发表在《和平研究》杂志和《外交政策》杂志，他还主编了《在暴力中使用非暴力》一书。乔纳森·平克尼在马萨诸塞州温汉姆市高登学院获得国际事务学士学位，毕业时获得了最高荣誉；他是2012年克贝尔学院谢寿康奖学金获得者；2016年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博士奖学金获得者。读研究生之前，乔纳森·平克尼曾经为埃及和印度的海外留学项目工作，并且帮助成立了国际巴拉特农村综合发展社，这是一个解决印度南部农村贫困问题的非营利组织。乔纳森·平克尼与伴侣一起居住在丹佛，喜欢公路自行车和野营。

ISBN 978-1-943271-06-1  
5 0675 >

